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6 年总第 6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IFF | **13th**
2003-2016
ANNIVERSARY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3届全球年会 (F20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6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围绕“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主题，思考重构人类社会价值基础，推动金融回归本质，完善基础经济体系，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全面可持续发展。



关于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 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 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 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 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从创立至今, 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 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 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 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 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 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 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 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稿件主要来源于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 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 特此说明。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6 年总第 6 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 Host
国际金融论坛 (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大会主席 / Chair
陆克文 Kevin Rudd

荣誉主席 / Honorary Chairman
保罗·沃克 Paul Volcker

联合主席 / Co-chair
陆克文 Kevin Rudd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让·克洛德·特里谢 Jean-Claude Trichet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理事会 / IFF Board of Directors
保罗·沃克 特里谢 肖卡特·阿齐兹 陆克文 韩升洙
Paul Volcker, Jean-Claude Trichet, Shaukat Aziz,
Kevin Rudd, Han Seung-soo
鸠山由纪夫 詹妮·希普利 辜胜阻 周延礼
Yukio Hatoyama, Jenny Shipley, GU Shengzu, ZHOU Yanli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陈云贤
Edmond Alphandery, Domenico Siniscalco, CHEN Yunxian
周汉民 图尔基亲王殿下 张继中
ZHOU Hanmin, HRH Prince Turki bin
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Saud, ZHANG Jizhong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ZHANG Jizhong, ZHU Xian, LIN Jianhai
宋敏 聂庆平
SONG Min, NIE Qingping

编辑部 / Editorial Department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Joanna Zhuang, SHEN Gang, WU Lixin

地址 / Address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开发大厦 22 楼
F22, Pearl Development Building, Hengli Tow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邮编 / Post Code 100095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 (IFF) 独家拥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IFF,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excerpted
without permission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在上海举行, 年会主题为“F20 倡议: 重塑金融本质”。年会期间, IFF 向全球发出 F20 倡议并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 经济、金融机构和企业领袖, 共同倡议建立丝路国际联盟 (SRIA)。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指出, “F20 倡议: 重塑金融本质” 极其引领时势, 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 促使金融资本的流动与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愿景相一致, 而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决策尤为关键。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 本届年会发表 F20 倡议、发起丝路国际联盟是顺应世界新形势和全球合作共赢大趋势, 是推动全球治理新发展的重要举措。IFF 希望通过构建 F20 全球网络, 积极引导金融回归本质, 服务实体经济, 重构和完善基础经济体系, 支持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全面可持续发展, 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思想做出积极贡献。

本届年会期间, 还举办了“IFF 第 8 期领袖对话会”, 韩国前总理韩升洙、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沙特国王基金会 CEO 图尔基王子以及意大利前财长、摩根士丹利副主席西尼斯卡尔科等, 共同围绕“绿色金融: 全面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增长”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话。

作为创立于中国, 由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参与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外交及战略智库平台, IFF 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IFF 将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研究智库和人才培养五大平台功能, 积极促进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

我们特别出版本期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特刊, 以共享智慧与真知灼见。



张继中
CEO / 创始秘书长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 (IFF)

IFF | 13th
2003-2016
ANNIVERSARY



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
F20 Initiative:
Restore the Essence of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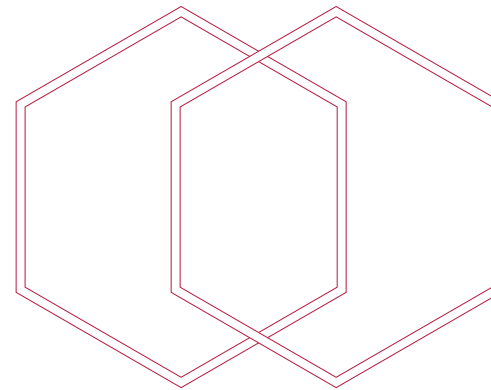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金融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目录 CONTENTS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以“F20 倡议: 重塑金融本质”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财经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人分析研判经济形势, 共同探讨应对之道。



P8 / 开幕式致辞

- 陈云贤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
广东省原副省长
-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 陆克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
澳大利亚前总理
- 韩升洙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P13 / F20 倡议: 重塑金融本质

- 重塑金融本质: 服务实体经济
- 发表 IFF: F20 倡议宣言
- IFF: F20 倡议启动仪式
- 陆克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
澳大利亚前总理
- 周汉民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
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
意大利前财长



P20 / F20: 全球治理新动力

-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
- 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
-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P33 / F20: 发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作用

- 后 G20: 新动力与新挑战
- 中国展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平衡
- 创新增长: 新兴经济体的活力与潜力

P47 / F20: 金融创新应促进增长力

- 数字金融: 治理与监管
- 科技金融: 区块链技术与互联网金融创新
- 普惠金融: 如何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P54 / F20: 促进金融稳定与合作对话

- 英国脱欧: 稳定与未来
- 当前世界秩序新形势与新挑战
- 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与合作对话



P62 / F20: 支持丝绸之路倡议与行动

- 丝路国际联盟倡议
- 丝路国际联盟启动仪式
- 丝绸之路合作新动力
- 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
共建发展模式

重塑金融本质， 支持全球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 陈云贤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广东省原副省长



陈云贤

在上海召开年会的不足之处和各项工作疏漏、不周到的地方，相信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圆满完成本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会。

昨天下午，国际金融论坛召开了第八期领袖对话会，并成功发布了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先生撰写的《为了全球利益》中文版演讲文集。晚上，我们还举行了非正式成员会议，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未来做出规划，讨论如何以IFF 13年的框架为基础，打造F20，重组全球理事会和执行机构。重组后的国际金融论坛（IFF）将以F20为目标，进一步利用和发挥IFF全球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研究智库、人才培养五大平台功能，打造国际一流的高级别常设对话和多边合作机制。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们设置了多场分会，包括全体大会、专题会议等等。国际金融论坛（IFF）2016年全球年会将正式发布F20倡议，发起创建丝路国际联盟（SRIA）。因此，会议将围绕F20倡议，讨论如何重塑金融本质，涉及全球治理新动力、金融稳定与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合作问题。希望通过与全球财经领袖

的高层对话，积极引导推动金融回归本质，重塑基础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思想和可行性建议。

重组后的国际金融论坛（IFF）将以F20为目标，进一步利用和发挥IFF全球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研究智库、人才培养五大平台功能，打造国际一流的高级别常设对话和多边合作机制。

从2003年创立以来，每年的11月初，国际金融论坛（IFF）都会召开IFF全球年会，邀请世界各国的财经政要、金融领袖和专家学者聚会在一起，就一年来的国际金融热点展开讨论，为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2016年，由于情况特殊，为配合在中国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我们将IFF全球年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月，并且第一次到上海办会。在仅有一个多月筹备时间的情况下，我们采纳了大多数成员的建议，召开一个较小规模、内部的闭门会议。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国际金融论坛（IFF），向出席2016年IFF第13届全球年会的各位成员、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帮助。

由于论坛理事会重组尚未完成，希望大家理解我们

开幕式致辞

重塑金融本质，支持全球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9
陈云贤，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广东省原副省长	
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促使金融资本流动与可持续发展愿景相一致	10
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	
要确保世界金融稳定，支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1
陆克文，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12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促使金融资本流动与可持续发展愿景相一致

■ 潘基文 / 联合国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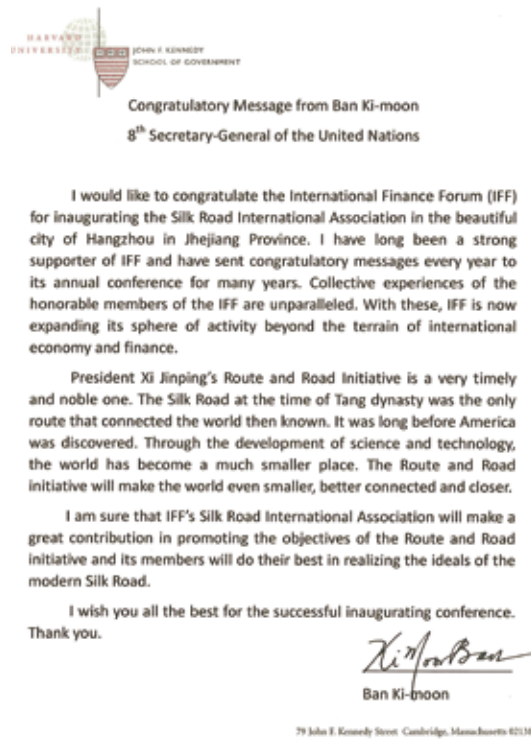


潘基文

恰逢世界发展处于关键阶段，2015 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纽约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程是为人类、和平、繁荣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制定的宏伟行动计划。在巴黎举办的第 21 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各国领导人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定》，并在亚的斯亚贝巴共同签署《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同意调动各国资源和技术，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友好合作达成此目标。上述历史性的协定是在需求疲软、经济大幅度波动的背景下诞生的。我们迫切需要经济刺激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国际金融论坛 (IFF) 提出的“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极其引领时势。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促使金融资本的流动与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愿景相一致。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决策尤为关键。

衷心祝愿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我们迫切需要经济刺激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国际金融论坛 (IFF) 提出的“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极其引领时势。

要确保世界金融稳定，支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陆克文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自 2003 年成立以来，历经 13 年风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前瞻视野的重要国际金融交流平台和战略智库。它与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有非常紧密的合作，这些领袖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通过合作，我们发现，智慧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都有可贡献的视野。

IFF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特别是 2015 年以来，国际金融论坛 (IFF)、丝路国际联盟 (SRIA) 与英国《中央银行》杂志每年定期联合出版的双语《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中国报告》，整理、收录顶尖思想家和决策者在年会期间产生的精辟观点和一系列专访、评论。我大力向大家看一看，这是非常好的报告，对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前，全球发展已经进入关键的临界点。如果紧密关注经济和增长趋势，关注国际金融发展，大家就会很清楚，我们仍然处于不稳定的时期。英国公投脱欧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我们要齐心协力，确保未来的金融稳定，确

保金融能够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2013 年，中国为了稳定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倡议，中国把它叫做“一带一路”倡议，但我更愿意叫它泛欧亚的全球倡议。它让我们思考如何利用金融推动从亚洲到欧洲、非洲、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增长。研究中国的经济历史，我们会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提高民生的保障。因此我个人始终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简称亚投行) 的建立，我也非常赞同加拿大总理最近提出加入亚投行。

一年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到通过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推动全球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进入更富足的社会。这些目标的实现，最关键的是要得到国际金融的支持。然而，我们现有的公共银行资源，比如世界银行、地区银行，包括最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些机构的资金加起来也不过是一小部分。要把可持续发展目标变成现实，需要更多的资金，IFF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论坛，需要搭建桥梁，让更多私人资本也参与进来，共同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我认为，中国倡议的亚投行 (AIIB) 和“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着手去做。

今年的 G20 峰会将在杭州召开。G20 峰会机制是 2008 年创立的，我是共同建构者之一，现在有人担心它会失去活力和动力，我相信中国会给 G20 峰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国际金融论坛 (IFF) 内部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一个 F20，把来自 20 多个重要经济体的银行、财政机构、私营机构集合起来，协助推进 G20 的议程。我认为在就业和融资方面，IFF 可以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再次代表 IFF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共同商讨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问题，谢谢大家！

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 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在上海这座美丽且具有活力的城市召开。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创立 13 年以来,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高水准智囊平台, 组织开展各种多边对话, 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家都非常尊重 IFF, 也了解它的全球年会, 今年正好又在 G20 之前召开。

G20 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三天后就会在杭州开幕, 今年是第 41 次首脑会议, 它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这里, 祝贺 IFF 提出的 F20 倡议。希望 F20 将来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金融合作论坛, 可以为创新、活力、互联互通、包容的金融做出贡献, 也希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东西间的联系, 消除一些瓶颈,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IFF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非常关键。当前, 国际经

济出现非常疲软的状态, 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今后的展望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英国脱欧又造成一些新的不确定, 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消费者的信心, 影响投资和金融发展。

亚洲的情况怎么样? 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增长率, 而中国则贡献了三分之二的一半。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这在贸易、资本等领域都已经体现。但最近亚洲的情况也不乐观, 也在下滑, 所以亚洲也需要适应新的、增长缓慢的环境, 这时候, 金融稳定变得至关重要。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 是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增长的关键。因为它可以支持更好、更有效的资源配置,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然, 借贷规模扩大得太快也可能造成某种脆弱性和新的经济危机。

因此, 要建立新机制, 支持良好的金融体制和市场, 同时建立良好的监管制度, 以减少风险, 保证稳定。

IFF 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此时提出 F20 倡议非常重要。

要建立新机制, 支持良好的金融体制和市场, 同时建立良好的监管制度, 以减少风险, 保证稳定。IFF 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此时提出 F20 倡议非常重要。

F20 倡议: 重塑金融本质

- 发布 F20 倡议, 打造全球金融 F20 平台 14
陆克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 推动回归金融本质, 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16
周汉民,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 加强全球协同, 解决金融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18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发布 F20 倡议， 打造全球金融 F20 平台

■ 陆克文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过去的讨论中，我们一直在交流“IFF 到底能做什么，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IFF 为完善金融体系、监管制度等提供对话与合作平台。但 IFF 仍有空间做更多事情，于是就有了新的创意——创建一个 F20，把世界上二十个重要的经济体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建立全球金融监管制度。

事实上，原来有一个类似的机构，叫金融稳定论坛 (FSF)，后来改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向 G20 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它的议程包罗万象，包括提出一些宏大、不好解答的问题。因此，金融界很多人提出应该有另外的声音，应该有更多私营部门参与，这些都有力推动了 IFF 提出 F20 的创意。

促进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看怎么更好地处理私营金融，怎么更好地平衡监管框架，不能太僵化，要保持足够的灵活，这样才能确保金融真正地投资于实体经济，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

这也是 IFF 的工作目标——为解决新出现的全球性风险，以及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寻找恰当的解

决方案。为了做到这一点，与杭州 G20 峰会相互呼应，IFF 发出了 F20 倡议，支持 FSB 和 G20 的工作，这是未来 IFF 的一项重要工作。

F20 倡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倡议建立全球 F20 网络，与目前中国政府已有的合作框架进行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

第二，倡议重塑金融本质，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这也是当前和未来 F20 的一个重要工作目标，即通过发展金融，支持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切实需求，帮助企业开展业务或不断壮大他们的业务。

第三，倡议打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当前的全球金融是否已经很好地服务了全球中小企业？像阿里巴巴这些企业的崛起，数字金融的革命性崛起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应该如何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服务好他们，是这条倡议的出发点。

第四，倡议通过金融对话，促进地区金融合作。我们希望在 G20 的相关平台，或者与其他机构一起打造国际性的金融合作、对话平台。

第五，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华尔街都举世闻名，但随着亚洲的不断崛起，亚洲金融在全球格局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国际金融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亚洲的经济体能发挥什么作用，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第六，倡议与全球绿色金融体系相配合，促进绿色金融发展。金融并不仅仅是帮助中小型企业变成中大型企业，更重要的是帮助一些国家摆脱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型，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第七，倡议打造更加包容的普惠金融格局。不仅要与传统的合作伙伴进行对话，还要与次发达的经济体进行合作对话。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贫困，当前还有大量赤贫人口，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我们也有更大的责任去改变国家金融治理结构，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服务。



第八，倡议加强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几个月前，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我和很多同事也讨论了如何发展金融创新性产品，同时又要保证监管制度跟得上。现在的电商、数字金融、数字经济带来了许多机会，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和挑战。对于监管者来说，如何让监管跟上这些新科技、新产品，不让风险累积，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第九，希望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各方面倡议。比如建立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和峰会，以此促进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更好地参与的机制，或者“一带一路”跨亚欧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

第十，希望适时建立 IFF 研究院。不断地邀请专家加入，进行对话，或者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对各个重要金融问题的研究，并探讨 21 世纪新经济条件下的新机会，是非常有帮助、有意义的。这不仅对政策决策者有意义，对各个国家也有意义。

最后，希望通过 IFF 的倡议打造 F20 平台。推动 IFF 从研究机构向研究院转型，促进 IFF 研究院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平台，培养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人才，更好地促进全球金融创新。

我们相信，通过建立 F20 全球网络能够促进 G20 倡议和 B20 (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 的工作，

能够为全球私营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为全球金融复苏和未来经济格局重塑做出贡献！

推动回归金融本质， 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 周汉民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

F20 倡议的主题是重塑金融本质，金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否还在遵循着金融的本质？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要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当把眼光聚焦到 8 年前美国雷曼公司倒下那一刻。从 2008 年到今天，8 年时间已经过去，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从中国国内角度看，近年来，民营经济的投资热情在减少；一些经济债务违约引发信用风险事件，拉低了金融资产的质量水平；实体经济低位运行的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蔓延，引发金融风险，这是极需要关注和加以有力防范的。

从国际角度看，2008 年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还远未消散，再加上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全球贸易保护制度抬头，恐怖主义袭击增加，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着全球实体经济的复苏。

金融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在对

危机本身进行反思的同时，更应该对金融本质进行追溯，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在不同历史时期，金融有着不同的内涵，但究其根本，金融的本质可以解释为资金的融通。金融发展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即通过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降低隐性交易成本和风险，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效率，最终促进社会福祉的增长。金融的演进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循环互动的，金融发展的目标不仅是通过金融产业本身的数量和规模增长来实现，还通过其所承载的金融功能的演进，对实体经济服务水平的提高来实现。

因此，金融与经济体现了一种双向关联，一方面金融应经济的需要而产生，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对金融起着引导、制约和决定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第一，实体经济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第二，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金融市场发展的标志。

金融自身的效率安排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绩效，决定了社会福祉增长效率。具体而言，也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金融业的发展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第二，金融业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的发展随时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金融血液的灌输，其筹资不外乎两条渠道，一条是间接融资，向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资金。借助各种各样的途径和金融工具，不仅可以分散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解决或缓解资金需求，更提高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效率。

第三，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金融业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现在，金融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作为实体



经济的后盾，更在诸多方面引领实体经济的走向。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化和证券化的泛滥使得金融的发展脱离了资金融通的本质，背离了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福祉增长的终极目标。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投机炒作的手段和工具，而投机套利成了金融活动的核心，为实体经济服务却正在沦为附属目标，这值得高度警惕。

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自我创新、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社会资本虚脱，实体经济空心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主动迎接改革的挑战，金融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服务。

首先，要充分发挥金融在帮助储蓄向投资转化进程中的重要媒介功能。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理财市场已经在执行金融的这一功能，但投资的有效性尚待进一步提高。

其次，要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资源跨时空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削减预算软约束，使有限的资源真正调配到有效的实体经济中去。

第三，要通过金融促进资源配置，推动更多的资源进入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拓宽瓶颈。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强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要以坚决维护金融安全为前提，不能增加、扩大金融风险，努力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总之，实体经济与金融互为肌骨，互相支撑。只有推动回归金融本质，才能服务实体经济，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全球的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也才能打造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加强全球协同， 解决金融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重塑金融本质”的主题很好地概括了当前国际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本届 IFF 全球年会以此为主题非常好。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 8 年，到目前为止，不同的国家所做的应对还是成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崩溃的边缘稳定下来了，但还有一些非常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现在的金融体系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它不怎么去看外面的情况，没有真正帮助实体经济，也没有为很多人

提供参与的机会，甚至是一种不平等的来源。各个国家的民意调查中，金融一般都排在最后面，这说明了大家对金融还有很多不信任。

因此，我想从欧洲或者说西方世界的角度，谈谈危机中呈现出来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当然，由于一切都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这些方案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金钱不只是一种交易工具，还要通过银行和整个金

融体系变成一种资本。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变化和改革，都是由资本支持和推动的。

要了解金融体系如何运作，就需要了解谁提供了资金、为什么要提供资金。一部分民众有闲置资金，而另外一部分人需要资金来扩大生产，金融体系就是把这两部分人放在一起，给他们搭上线。

我之前也提到一种思维定势：现在的金融体系依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就是说金融体系用自己的钱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并没有向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比如说，在意大利或者美国，大概有几百亿欧元被用于金融体系本身的目的，而没有被投入中小企业手里，尽管它们很需要这些钱。另外，因为金融带有逐利的倾向，有时候投资方向并不是最需要的地方，这就会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再有，金融体系短期借贷过多，事实上，很多领域都是需要长期投资的，比如环境保护。基于这种长期投资的需求，需要把金融机构投资的战线拉得更长。最后一点是，在很多国家，金融机构的高管每年有几百万美元的收入，薪酬过高，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进行修正？我没有全部答案，不

仅是我，没有人知道要如何解决所有问题。很多人提到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包括政府监管机构 and 议会监管，在欧洲，议会进行了相关立法，确实，需要不断推进金融监

管。同时，还需要向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支持，让它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比如欧洲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TLTRO) 项目，就是向银行提供流动性，并要求银行向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如果银行证明它的贷款给了中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央行就会给它更多的优惠政策。还可以采取消减拒绝向实体经济借贷的银行的储备金借贷等措施。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创建维护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需要各方的努力，包括好的治理控

现在的金融体系依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就是说金融体系用自己的钱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并没有向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制体系，好的透明度等。

在金融借贷方面，有两件事情需要解决。首先是要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指导，德国和欧洲等国家都有相对长期的投资计划，需要在各国金融系统中给予这些长期计划一席之地。还有一些基金可能对短期收益的追求并不高，而是更看重 15 ~ 20 年，甚至更长期的战略性投资，要鼓励这样的基金。同时，还要对进行长期投资的个人提供支持和激励。

风险管控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欧洲议会的制度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任意实体的借贷规模都不得超过其负债的两倍以上。这是一些相对直观的控制举措，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潜在风险。

这些举措都是各个国家采取的个别行动，但金融的流动性很高，需要全球协同来实现对风险的控制。国际金融论坛 (IFF) 的重要性也在这方面有所体现，IFF 是一个更宽泛、具有全球包容性的平台，能够把利益相关方、重要人物都邀请进来，中国的、世界的、政界、商界、学术界等，同时还可以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系在一起，可以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联系在一起，大家进行广泛的合作与协调。

《迈向 2030 的联合国：在裂变的世界中重塑全球秩序》出版的重要意义

■ 陆克文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世界当前正处于深刻变革的阶段。地缘政治方面，美俄、美中、中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都是本世纪新出现的情况。

全球化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全球化让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情绪的高涨。

另外，科技也一直在推动全球秩序的变化。通过科技发展，各个国家不断调整自己在全球的角色和作用。在全球的创新发展中，这种变革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频繁。过去 15 年，全球科技版图发生了很多变化，给人类和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涉及经济、环境和人类发展等方面，也涉及全球治理的形势。

总之，全球的安全、金融、经济、科技都面临着一些威胁，而治理缺乏则导致这些威胁没有办法得到有效解决。地缘政治、科技等因素都超出了国界，需要国家和政府做出一些转变，打造一个全球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水平，当前显得尤为迫切。但现实却是全球治理情况反而退化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

世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G20 等国际组织和框架都遭受了挑战，甚至是面临着威胁。

比如有些国家会绕过联合国，自说自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一些全球性的危机。

IMF 也面临一些挑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IMF 的总裁就清晰地认识到，IMF 自身并没有能力独立解决当时面临的危机。因此建立了 G20 峰会机制，来协调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是对 IMF 功能的补充。

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也深受保护主义之害。

我是 IFF 的主席，在过去两年，我们对联合国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观察和评估，昨天在纽约发布了《迈向 2030 的联合国：在裂变的世界中重塑全球秩序》报告书，今天在上海发表中文版本。

这本报告书讲的当然都是直接与联合国有关的话题，如人权、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战争等。但我们的工作要分两层：第一，怎么让多边主义真正在国际治理中发挥作用；第二，怎么让全球金融治理和世界治理真正可落实，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支持。

当我们观察联合国时，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多边主义本身有什么价值？多元化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做未来的治理？

首先，多边主义的优点之一就是它有一定的威望，被各方广泛接受。联合国 195 个成员国，大家都是相信多边主义的。

第二，多边主义本身就具有一种活力，通过多边机构可以代表全球、代表所有国家来说话。

第三，联合国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可以制定出一些全球性的规则、法律和标准。

第四，只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才会提出一些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各种各样的争端。

第五，多边机构不仅可以解决冲突，在某些冲突中还可以采取一些大家都同意的行为。

其实，多边主义是一种相当深厚的智慧，它可以让人们围绕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团结起来。但也应该担

F20: 全球治理新动力

《迈向 2030 的联合国：在裂变的世界中重塑全球秩序》出版的重要意义	21
陆克文，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消除贸易壁垒，提高全球治理水平	23
卡拉·希尔斯，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前贸易代表	
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合作	25
章新新，中国新闻社社长	
改善全球治理，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	26
尼古拉斯·霍普，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全球治理的新动力	27
庞中英，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中心主任	
基于 SDR 构建全球汇率管理稳定机制	28
丁志杰，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	
加强六方面研究，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30
张礼卿，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南南合作需要新的融资模式	32
王燕，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IFF 研究院副院长	



率的承认，多边主义的问题也是巨大的。比如，让 195 个国家取得共识变得越来越困难；多边主义往往速度比较慢、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一些非常紧急、需要得到立即解决的问题上，多边机构的效率太低了。总体来说，尽管多边机构有很多问题，但它的优点远远超过了弊端。

实际工作层面，要理清联合国和 IFF 的议程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现在国际社会就必须行动起来。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靠各个国家去行动，而那些最有需求的国家却往往难以得到国际上的金融支持，从而导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我们在这本报告书里呼吁三方之间开展合作。第一是联合国，联合国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框架；第二是世界银行和其它公共银行、亚投行等；第三是私营资本。这三方必须往同一个方向努力。有人在批评亚投行，我却认为中国正在做相当大的努力，来资助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以推进可持续发展。即使这样，亚投行和其它公共银行可以提供的资金犹如沧海一粟，因此要充分利用全球的私人金融。

联合国、世界银行和私营机构如何达成合作？首先需要找一些非常具体的切入点，提出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把它们变成可赞助的具体项目，这需要花大工夫。另外需要考虑怎么利用公共资产来减少或缓解风险，以便让

私营资金也敢于投资这些项目。希望有新思维、新想法、新理念来解决这些问题。

消除贸易壁垒， 提高全球治理水平

■ 卡拉·希尔斯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前贸易代表



卡拉·希尔斯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3 届全球年会有两个新倡议：一个是 F20 倡议，另外一个是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SRIA)。我认为，这两项努力可以积极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通过开放市场进行贸易和投资，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是消减贫困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从 1947 年关贸总协定 (GATT) 签署以来，在产品、服务、资本等领域都出现了大量开放市场，这使强国、弱国、富国、穷国都受惠匪浅。有经济学家估计，开放全球市场使美国 GDP 增加了大约一兆美元，同样也提升了开放国家的经济，改善了开放国家的治理，发展中国家同样能从中获益。一位经济学家说，发展中国家把贸易产出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贫困就会减少一个百分点。

而贫困国家扩大贸易机会也同样会加强全球安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就会使他们的贫困人口在贫困中煎熬，从而更容易被恐怖分子吸引招聘。如果贫困国家无法稳定经济、稳定社会，全世界就更难以解决组织犯罪、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行为。

国际社会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的阴影。2016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把 2016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 3.1%；4 月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简称世贸组织) 发表声明说，世界贸易的增长预计到 2016 年底仍然会缓慢停留在 2.8% 左右，并且未来有下行压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也表示，这是连续第五年贸易增长低于 3%。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率是 7%。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对贸易和投资的管制。这些年，贸易壁垒在不断增多。根据世贸组织的一份评估报告，从 2015 年 10 月中到 2016 年 5 月份中旬，20 国集团 (G20) 经济体已经推出了 145 项新的贸易管制措施，平均每个月有 21 个新的壁垒。自 2009 年至今，已有超过 1500 项保护主义措施出台，F20 应该对此高度关切。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有一系列仍然在持续的谈判，但很少听到进展。如果这些谈判能够有成果，会非常有意义。比如《贸易便利化协定》(TFA) 可以加快商品通关，也会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海关合作。通过这个协议可以促进每年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贸易，而且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小微企业也会最受惠。目前，这个协议已经有 70 个成员国通过了，但它需要世贸组织成员的三分之二，即 108 个国家通过才能生效。

同样，2015 年 80 个世贸组织成员初步同意扩大 1996 年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以消除 201 项 IT 产品的贸易壁垒。这占世界贸易的 7%，相当于每年 1.3 万亿美元。但此协议需要世贸组织 90% 的成员国，相当于 147 个国家的通过才能生效。

再有一个《环境产品声明》(EPD)，它涵盖一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个市场在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是 8%。今年 4 月，美国和中国都声明同意通过，另外有 20 个国家也表示会在 2016 年底之前通过。非常期待这一协议能早日生效。

上面表述的这三项协议，都存在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就是说每一项协议都需要规定数量或规定比例的成员国通过才能生效。而一旦协议生效，那些不同意通过的国家，



同样会从中受益，但他们不会承担责任，这就是搭便车问题的矛盾。

除了这三项协议之外，还有另外两项协议只会惠及通过它的缔约国，一个是《服务贸易协议》，这个市场现在存在很多管制，尤其是在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这些不必要的监管和管制，相当于 50% 的关税，要尽量消除。第二项是《政府采购协定》，公共采购平均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 10% ~ 15%，这个协议可以确保采购的透明和竞争。

上面描述的五项协议都能够大大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这正是国际金融论坛 (IFF) 通过 F20 可以发挥作用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与各国政府、企业界的沟通，解释为什么开放这些市场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所有国家、所有企业都能够从中获益。

全球化进程正受到挑战，但我非常有信心，F20 可以为之发挥作用。

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合作

■ 章新新 / 中国新闻社社长



章新新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全球治理新动力。在我看来，这个主题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合作，其二是变革。

全球治理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所讲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所以全球治理就意味着携手与合作。

再过几天，G20 峰会将在中国的杭州召开，我们都希望在这届峰会上能够达成有效的全球治理目标。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 G20 所发布的公报或声明中，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合作。这表明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下，全球治理仍然是通过国际合作，管理、控制、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挑战、问题、危机乃至威胁。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全球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合作，这是我对今天“全球治理新动力”主题的第一层解读，变革则是我的第二层解读。

20 年前，中国还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大门外徘徊；20 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 G20 的主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秩序重建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对

世界发展不断做出贡献的必然结果。期间，中国一直在创新求变。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格局在发生变革，我在中国新闻社工作 36 年，作为媒体的实务操作者，对这些变革感慨颇多。

当世界对中国的期望日益增强，作为肩负与世界沟通使命的媒体，又当如何在媒体变革与全球治理的变革中寻找新的动力呢？

首先，积极报道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和战略融合点，客观理性地报道合作、分歧和争端，促进合作、扩大共识、减少误判、凝聚智慧，着眼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媒体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

其次，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求国际合作，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只有在国际舞台上准确地传播各国的国情，加强国际合作，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传播模式，才能有机会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影响。

第三，媒体应该在变革中创新，以媒体的力量为深化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汇聚智库资源，促进和引领各国间的合作，并利用好智库资源推出研究成果，推动全球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最后，构建沟通世界的话语方法，发挥媒体在文明文化间互识互鉴的作用，以正确地解读和引领舆论，消减负面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推动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互识。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在全球治理中怎样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当前国人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媒体也在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文明的交融互鉴贡献智慧。作为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中新社愿与世界各国的媒体组织机构在各个层次、多领域展开交流合作，为全球治理贡献全球智慧。

改善全球治理， 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

■ 尼古拉斯·霍普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尼古拉斯·霍普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全球治理的问题，我觉得很难乐观，我们很难看到世界各国的政府为了大家的福祉联合在一起做一些明智的决定。事实上分裂越来越严重，希望这次杭州 G20 峰会能够促进全球治理，尤其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美国总统候选人表达了这样的意图，从自由贸易往回走到贸易保护主义；许多国家也都在通过税率进行贸易竞争。尽管也有很多关于自由贸易的谈判，但现在多边贸易谈判的一个替代选项是区域贸易谈判，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况。从中我看到了不断分化，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的团体形成后，便很难回到多边谈判的框架下了。

全球贸易总量在不断下跌。我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但 2015 年之后，五个世界主要贸易体中只有一个国家的贸易量是高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就是中国。其他的主要贸易国，像德国、日本、韩国的贸易水平都下降了，都低于 2008 年。

关于一些区域性的协议或者倡议的情况，我认为也不容乐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是 12 个国家签署的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希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品保护、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方面达成合作。我感觉 TPP 不错，持比较积极的支持态度，但好像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民众反对这个贸易协议，因此估计政客都不会去推动这个协议的通过，看来美国大概是不可能批准 TPP 了。

还有一些区域自由贸易的创举，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东盟想与印度、中国、日本，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建立各种各样的地区贸易，这个协定到底能不能成功，我认为希望不太大。因为把印度加进去，事情就会变得很困难，印度人认为开放是对别人都有好处，但自己会吃亏的事情，这种思想和态度之下，与印度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是对欧盟和美国都非常重要的协定，但现在英国脱欧，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了，我觉得这个协定可能也要泡汤了。

还有一个双边投资协议，《中美投资协定 (BIT)》，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落地实施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相投资太少了，如果 BIT 可以通过，那将会增加两国之间的双边投资，也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大家都会从中获得大量好处。中国的贸易部长说，现在正在等待负面清单，希望这个负面清单可以短一点。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觉得有很大的潜力，应该受到欢迎。但有些人，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都在猜测中国的动机，认为中国是为了开创一些贸易路线，或者是想增加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或者是通过在亚洲邻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投资，提升中国内部的经济活力。这些解释可能有道理，但我觉得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以前被非常忽略地区的经济发展，所有的质疑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促进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只能是好事，不可能是坏事。

全球治理的新动力

■ 庞中英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中心主任



庞中英

全球治理的新动力无疑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目前总的形势是全球治理的赤字巨大，而且这个赤字还在继续扩大。因此，旧的国际制度和世界秩序需要重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前正处在转型之中，最明显的就是对待全球治理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相较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世界某几个大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就显得

有些消极了。中国选择了多边主义，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在 21 世纪更加需要全球治理。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对全球治理有着深刻的理解，需要找到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面对严峻的挑战。

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就是增加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中心性 (middleness)”。就是说中国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处在中心的中国，能否协调其他国家？这次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主要是中国协调

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这对中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或者作用，不仅仅是参与者，中国也是全球治理的改革者。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改革者的角色是非常清晰的，也是非常坚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以及 G20 等领域，中国正在发挥新兴的国际领导者作用。例如，中国发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和“一带一路”倡议，我想这些还只是初步的，今后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改革者和领导者，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努力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促进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的良性转型。中国也仍然需要学习多边主义，学习全球治理，在参加、改革和领导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中国的全球治理政策。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为改善全球治理积极努力的同时，也应该鼓励更多有条件、有资格的非政府组织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我说的是以中国社会为基础的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改革者和领导者，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努力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促进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的良性转型。

非政府组织，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就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之一，尽管这个组织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还很年轻，但我认为 IFF 是国际的和全球的。中国有很多国际论坛，但是真正具有国际性和全球

性的论坛并不太多。在本届年会上，国际金融论坛 (IFF) 提出了两个倡议——F20 倡议和丝路国际联盟倡议，我想这就是 IFF 对全球治理的具体贡献。

我本人希望今后国际金融论坛 (IFF) 能够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具体贡献。比如，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国际金融论坛 (IFF) 的 21 世纪全球治理委员会。1992 年冷战结束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现在国际金融论坛 (IFF) 可以组织一个新的 21 世纪全球治理委员会，为全球治理提出新的理论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全球治理方案。

基于 SDR 构建全球汇率管理稳定机制

■ 丁志杰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



丁志杰

大家知道，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发挥特别提款权 (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 的作用，是即将召开的杭州 G20 峰会的重要议题，但能否就这一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决于是否有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SDR 的困境。

我曾经说过，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突然宣布废止 SDR，不管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我个人觉得这个新闻的宣示效应可能比实际影响还要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SDR 目前还处

于婴儿期，还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记账单位。SDR 是 IMF 1969 年拟定的，我和 SDR 同龄，我已经是成人，但 SDR 还在婴儿期。如果真的取消，可能对世界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IMF 分配过三次特别提款权，大概是 2041 亿，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多边的

信贷安排，如果没有 SDR，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甚至以人民币来计价的信贷机制。

第二，中国推进 SDR 使用中的探索。可以说中国现在是最熟悉 SDR 的国家，一个月以后人民币将正式进入 SDR 货币篮子。由此事件引起了中国了解 SDR、研究 SDR 的热潮，中国政府也很热衷 SDR。从 2015 年年底开始，中国积极推进 SDR 的使用，比如说由 SDR 公布国际收支、官方储备数据，并构建了以 SDR 货币篮子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指数，还引入了 SDR 债券，就是世界银行目前正在发行中的木兰债券。中国的一系列做法，应该说值得肯定，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SDR，但我们看到它还仅仅局限于发挥 SDR 的记账功能。如果要真正发挥 SDR 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要将 SDR 从货物、金融交易的记账单位发展成为重点为各国货币定价，在各国汇率安排乃至全球汇率安排中发挥作用。

第三，SDR 与全球汇率稳定机制如何摆脱困境。

尽管国际社会大力推行浮动汇率制度，但依然有超过 60% 的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运用各种方式对汇率进行管理，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从来没有实现过稳定。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过去 10 年，每年有超过 10% 的国家进行了汇率制度调整。汇率的不稳定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难度，中国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管理有两个困难。第一个是如何实现汇率的稳定，第二个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好的稳定汇率锚。在这方面 SDR 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是一篮子货币，价值相对稳定。由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鼓励发展中国家选择以 SDR 作为汇率锚，尤



其是那些已经在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从钉住单一货币转向钉住 SDR 这种复合货币。IMF 可以建立一个 SDR 基金来支持这些国家，大家知道 SDR 目前的分配是以份额为基础，也就是份额越大，获得的融资越多，这实际上与各国的需求不一致。建议未来在 SDR 的分配中，考虑到与汇率制度安排挂钩。

第二，IMF 现在公布 5 种货币进入 SDR 货币篮子，未来应该公布更多货币的 SDR 汇率，并将这些汇率进行指数化，用于监测和分析全球汇率的稳定。

第三，鼓励大国建立货币汇率协调和稳定机制，尤其是 SDR 篮子货币，现在是五种：美国、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这五种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是为全球提供稳定的货币和汇率环境的基础。

加强六方面研究，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 张礼卿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张礼卿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个人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领域有六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究竟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世界需要美元霸权，因为美元在享受货币特权的同时向世界提供了有助于金融稳定的公共产品，存在了近 30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霸权稳定论”。研究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期间，是 19 世纪后期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概率最低的一个时期。但以周小川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元作为一种主要的主权货币，它充当国际货币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霸权稳定”没有理论依据。

针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出现了许多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都面临很大的实行困难，因此未来一个时期，美元的主导型地位难以改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09 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为多元储备体系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不过从长远看，要想真正实

现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恐怕还应该积极推动超主权货币方案。因为这种方案可以使各国有更好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全球化，也是多边主义理念的真正体现。因此，我个人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还是应该定期甚至每年增加 SDR 的发行，并在实施层面创造积极的环境。

第二，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降低重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受国际协定的约束，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尽管是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协调。1973 年以后，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性明显下降。美国次贷危机很快酿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其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稳定造成冲击。这表明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溢出效应，它们之间的协调越来越重要。

第三，如何建立健全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防范日益明显的流动性冲击。在缺乏有效政策协调的时代，全球金融动荡将无法避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生因国际资本冲击造成的金融危机。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措施进行应对，比如积累外汇储备、签署双边货币协定、参与区域性金融一体化，以及在危机时寻求 IMF 流动应急贷款等。这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充分。未来，如何采取更多措施维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四，如何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是双重的。过去几十年里，主流的声音是“应该使资本流动更加自由”，但我们也发现，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会造成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尤其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资产价格的泡沫生成与破灭。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IMF 在 2012 年改变了其长期以来鼓励资本账户开放的传统立场，认为在大规模资本流入冲击时，一国可以实行资本管制。这个转变



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仅仅从流入国角度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是不公平的。因为无论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实行资本管理，政策代价基本上都是由输入国承担，而与输出国无关，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引发的金融动荡，不仅与输入国有关，也与输出国有关。探索由输入国和输出国共同参与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框架，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协定对资本流动进行双向管理，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五，如何对现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 IMF 进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运行了 70 多年，前 30 年它的基本特征是双挂钩，1973 年双挂钩瓦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存续下来，主要标志就是它的机构 IMF 和世界银行依然在发挥作用。客观上讲，这两个机构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金融稳定、消减贫困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但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重大变化，必须对这两家机构的治理结构，特别是份额、投票权结构进行改革。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还需要更多努力。

第六，如何对全球金融业进行监管。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给予了高度重视。在 2009 年召开的 G20 伦敦峰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作为促进全球金融监管的主要机构，与 IMF 一起对全球金融风险进行预警

和处理。会上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特别是对不同国家需要不同的具体方案。

以上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需要积极推进。如果能够成功推进，未来的全球金融体系就会是稳定的，否则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面临金融动荡。

南南合作需要新的 融资模式

■ 王燕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IFF 研究院副院长



王燕

关于南南合作和融资的发展，我分享四点内容。

第一，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的关联度和重要性会逐步下降。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也是国际金融论坛 (IFF) 出版《迈向 2030 的联合国：在裂变的世界中重塑全球秩序》(以下简称“迈向 2030”)这本书的背景。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在全球投资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在逐渐提升，到 2050 年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的比例会达到 50% 以上。基于此，大家预测，2015 年之后，融资协助将会更多来自于 OOF (其他官方资金, Other Official Flow)，而 ODA 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下降。

第二，发展和经济的专业性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迈向 2030”这本书中，我们讨论了 ODA 援助往往比较低效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就是这种非关联性的援助把援助与贸易分割开来了，这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不大好的，因为这分割

了捐助国和捐助使用国的关系，所以传统南北合作的有效性就打了折扣。

另外，我认为资本向下的开放跟增长是没有关系的，而 IMF 的研究中则提到资本向下自由化之后，有超过 150 次的流动性风险被引发，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思考，需要百家争鸣，欢迎大家提供更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第三，“迈向 2030”这本书密集讨论了南南合作的问题。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全面展开，但在我看来，南南合作与贸易、援助、投资是一体的，不能把这些不同的部分拆分开来，有很多工具都是把援助与投资绑在一起的。这也是中国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南南合作政策，这需要非常长期、很有耐心的资金，中国就曾经通过这种模式，帮助陷入债务困境的厄瓜多尔重回世界经济格局中来。

第四，中国吸取双边援助中的经验和教训，逐渐转向多边援助体系。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简称亚投行) 后，很多国家在申请成为它的成员国，目前已经有 57 个成员国了。从双边政策逐渐转向多边政策，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全球治理是一个利好的信号，对全球经济发展也利好。对此，我们的建议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建设评估体系，加强对海外发展计划、海外援助计划、海外合作项目的评估，包括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影响、对环境的影响等。

F20: 发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作用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球金融治理 辜胜阻，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34
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作用 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 G20 事务原协调人	36
世界各国要共同谋划，应对全球挑战 于洪君，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38
以经济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 李钟和，高丽大学教授、韩国前 G20 协调人	39
技术发展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新机遇 诺曼·达尔，巴基斯坦哈比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40
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尼古拉斯·霍普，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41
不必夸大“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 张礼卿，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43
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陈兴动，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法国巴黎证券 (亚洲)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45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全球金融治理

■ 辜胜阻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辜胜阻

20 世纪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经济危机。第一次是 20 世纪 30 年代, 当时的总统推行了“罗斯福新政”, 使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政策措施是扩大有效需求; 80 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滞胀, 当时的总统采用的是“里根经济学”, 使用的是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理论, 政策措施是扩大供给。所以在讨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 往往有人把它和西方的供给学派相提并论。事实上,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很大区别, 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

“里根经济学”有四大支柱, 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 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减税、松绑、节支、紧缩。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不一样。

要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要把握它的三大关键词, 以及相对应的三大任务。三大关键词方面, 第一个是供给侧, 就是要靠创新驱动来提升产品质量和提高经济效益, 特别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个是结构性, 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很不一样, 中国现在面临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第三个是改革, 就

是要靠制度供给来调动人的积极性。

与三个关键词相对应,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大任务。第一项是结构优化, 就是要做好加减法。做减法就是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做加法主要是补短板。第二项是创新驱动,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提升产品的质量, 提高效率, 这要靠创新驱动。第三项是通过改革, 引领制度供给。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 要清除无效供给, 化解过剩产能。要改造落后供给, 提高供给质量, 还要创造新增供给, 释放新需求。要扩大短缺供给、增加公共产品。比如中国有 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超过 2.8 亿的农民工, 他们需要大量的公共产品供给。要强化制度供给, 特别是通过制度改革来调动人的积极性。

要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次是防止认识上的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不能把供给和需求对立起来。有人说 2016 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 好像过去没有供给侧的改革, 现在才有。实际上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是不可分的。过去更多的是需求刺激, 现在要转向更多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侧重点不一样了。第二个误区是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求学派混为一谈。第三个误区是不能认为以前的改革都是需求刺激, 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扩大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供给, 重要的是要提高效率, 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

要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是要依靠三大主体。一是市场主体——企业家, 包括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二是创新主体, 也就是创新人才和科研人员。三是改革主体, 就是领导干部。这三大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定了改革的政策能不能落地, 所以要改变企业家成本太高不能为, 科技人员缺乏激励不想为和领导干部不作为、不会为的局面。

要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是要用好三大引擎。第一个引擎是“中国制造 2025”, 或者说“两化”的深度融合。工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战场, 现在德国提出工业 4.0, 美国提出产业互联网, 中国也提



出了“中国制造 2025”, 就是要发挥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作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优化企业管理、产业结构和城市治理, 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引擎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有四波大的创业浪潮, 第一波是 1978 年以后出现的草根创业, 就是大量农民、城市的无业人员创业; 20 世纪 90 年代, 尤其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出现了一个市场化改革的高潮, 当时有媒体报道, 有十万工人和一大批科技精英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 这是第二波精英创业浪潮。第三波创业浪潮是 2000 年之后, 随着互联网兴起, 出现了以互联网新经济+海归所形成的第三波创业浪潮。第四波创业浪潮不仅有草根创业, 还有精英创业, 大量留学人员从海外回国创业, 大量大型科技企业的高管离职创业。这波创业浪潮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形成双轮驱动, 创新、创业、创投形成一个铁三角。创业创新也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和失业的一个重要引擎, 尤其是在对冲失业方面, 现在每天新登记企业有 1.4 万户, 这是一个量大面广的创业群体。

第三个引擎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需求, 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即将在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议

题——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是为了绿色发展, 普惠金融是为了包容性增长, 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稳定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驱动力。G20 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平台, 以此为主题, 也是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在全球治理中 发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作用

■ 何亚非 /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G20事务原协调人



何亚非

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的上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很大变化，全球治理也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现在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己身上，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内治理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更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标志着全球治理出现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折。

再过几天，中国作为 G20 主席国，要在杭州举行峰会。国际社会对此寄予厚望，希望 G20 峰会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创新增长增添新动力。要在全球治理领域实现这些重要目标，关键是要充分有效地发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作用。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始终并行存在。结果怎么样？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无一不陷入了发展陷阱，遭受治理失败、经济落后的局面。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后来成为美国

和西方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政策。它的核心是政府越小越好，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这个政策希望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涓滴效应”，就是富人来消费，滴下来的水惠及穷人。但显然这有利于资本和保护资本的保守政党，所以大家看到奉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都遭受了厄运。

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它符合中国国情，并能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完善，所以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世界银行的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中国自 1981 年以来，按照国际贫困标准，已有 7.28 亿人口脱贫，完成了全球减贫总数的 83%。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和经验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享受了中国发展的红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在 G20 等国际舞台上，全球治理思想和理论的更新需要借鉴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成功的创新和实践。

其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匹配，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等待和拖延都会造成世界经济的停滞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失速。因此全球治理，包括金融治理，要跟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要加快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治体系的转变，关键是要增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就是说要给全球治理注入新鲜的血液，包括新思想、新理念，使这个体系更加公正、公平、合理。

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完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的建立和定价货币多元化的尝试，IMF 和世界银行体系的进一步改革，都应该积极稳步地推进。期望 G20 能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当然，改革不是要推翻现有体系，而是进行修补、调整，使它更加完善、更有效率。

第三，这次杭州 G20 峰会把发展问题正式列入议程，这表明各个国家，特别是 G20 成员，在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直在联合国与 G20 积极推动发展问题，并身体力行。在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方面，中国是做得最好最实在的。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渠道，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 MDGs 目标，尽到了国际主义的义务以及全球性大国的责任。

为什么重视发展问题很重要？它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第一方面，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强劲增长是世界和平的经济基础。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发展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平衡发展，世界经济的失衡就不可能消除，再平衡也很难实现。第二方面，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总体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而且这不仅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目前，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泛滥，其实就是这种深层次矛盾的表象反应。

只有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才会使全球化进程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北美、拉美国家都能够从中获益，最终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中国倡导的是一条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合作的新道路、新模式。

在全球治理中如何发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要紧紧抓住 G20 这个重要机制，让 G20 真正发挥协调统筹世界经济的作用。因为 G20 是现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

济体进行平等对话和协调全球经济治理唯一的、最高的平台。把 G20 转变成具有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的长期性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在 G20 范围内，加强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需要给予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更多的话语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性，推动世界秩序的顺利过渡。

总之，世界在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要变化，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跟上历史的步伐。

世界各国要共同谋划， 应对全球挑战

■ 于洪君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

长期以来，在观察世界形势、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问题上，西方主体论、西方核心论一直占有优势地位。人们都习惯地认为，西方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世界经济走势如何、发展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西方，发展中国家常常被忽略。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改变的态势非常明显，力量对比也正在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这应该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另一方面，大家都意识到，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同国家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借重的态势不可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重大影响，这更加表明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也正是国际有了这样的新认识、新判断，G20 才应运而生。G20 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尽管现在它还是一个新事物，还不完善，但这是

人类社会探索共同命运，走向共同未来的进步。

从 2008 年到现在，8 年过去了，尽管国际社会通过 G20 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多边机制和平台，交换意见、沟通想法、协调政策、共同监管，但危机的阴影仍挥之不去。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很严峻，发达国家总体上看日子还很难过，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也普遍比预想得要严重，甚至有“金砖褪色”的说法。2015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较上一年萎缩 3.7%，巴西大致也是这样一个水平，南非增长仅为 1.3%，是 2010 年以来最低。只有中国和印度还保持总体较高的发展态势，但中国也从过去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期。

总之，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和作用。

首先要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舞台和空间。比如在各种各样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组织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中国的全面复兴，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持开放、欢迎、合作的态度，而非抵触、怀疑甚至拒绝。

其次，发达国家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创新合作机制、推动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仍负有巨大的历史责任。不能因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就把责任完全推给发展中国家，推给新兴经济体或者推给中国。世界经济出现目前的局面，大家要共同查找原因、分担责任，共同谋划出路。

在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统一认识、创新思维、明确责任，要相向而行、携手并肩，推进各种体制机制的建设。中国正在尽最大可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不仅仅是理念和概念上的，而是有切切实实的行动和计划。比如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创”活动，是中国为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引导世界经济走出低谷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G20 领导人峰会马上就要在中国杭州召开，国际社会对此充满期待，相信国际社会能够在 G20 平台上更好地谋划未来。

以经济结构改革 促进经济增长

■ 李钟和 / 高丽大学教授、韩国前 G20 协调人



李钟和

世界经济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复苏比较缓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五年间经济增长一直在下滑。新兴经济体情况有好有坏，但是几个大的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巴西、俄罗斯，都在经历着比较严重的经济下滑。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变缓，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另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了一些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紧密的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经济下滑。

以上是国际大形势，是外部因素，国内因素也对经济下滑起到了很大作用。国内因素主要是一些结构上的弱点，疲软的国内消费需求以及一些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金融和货币的刺激没有能够实现应有的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表明，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得比较严重。低收入国家因为政策以及经济结构上的原因，也影响到了它们的发展潜力。

在这样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实现强有力的增长，变得非常重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

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决策者应该更加重视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改进他们的生产力，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机构的质量、技术的投资和金融市场等。中国 2015 年的经济增长是 6.9%，这是自 1996 年以来最低的，而且 2016 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继续下滑。所以，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中国多年来的以投资驱动的扩大生产，已经造成供应过剩。最典型的是房地产供应过剩，还有很高的杠杆率。这些情况如果继续恶化，肯定会造成很多问题。

服务领域的扩大以及更多的消费，当然是令人鼓舞的，但这不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增长引擎。如果把资源从工业领域转入服务领域，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生产力下降。

回顾中国的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一个推动力。由于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中国很难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如果想靠投资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对于中国 GDP 的增长，有很多预测。我认为在今后 10 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先下降到 5% ~ 6% 左右，最后下降到 3% ~ 4%。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中国当然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怎么样增加生产力是中国应该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我希望中国能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经济政策，提高生产力，从而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技术发展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新机遇

■ 诺曼·达尔 / 巴基斯坦哈比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诺曼·达尔

技术发展使新兴国家更多人有机会学习怎么开展商业活动，并与世界其他地方取得联系，从而促进新兴市场国家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一百年间，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入，包括学校、交通、电话线等，而更好、更广泛地使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各种各样的 App，使人们对旧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使新兴市场国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新技术在巴基斯坦起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开创了哪些新机遇。

巴基斯坦的通信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固定线路网络时代，巴基斯坦大约有 1500 万网络使用者，大部分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地区。手机可以连入网络后，巴基斯坦 2 亿人口中有 50% 接入了移动互联网，到 2016 年 7 月份，有 3000 万巴基斯坦人使用了 3G、4G 网络。能够让这么多人使用互联网，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巴基斯坦一些地区几乎不可能铺设基础设施，让大家有座机、有固定线路通信，尤其是在山区。

农业是巴基斯坦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现在农民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拓展信息渠道，他们利用这些方法

了解气候变化和新的农耕技术，在新技术、肥料、杀虫剂等方面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从而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资金，提高生产力，改进生活方式。

许多跨国公司也在利用手机改进供应链，改善供应服务。教育方面也需要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小学和初中的基础设施还不错，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设施比较欠缺，尤其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技术也在改变这一切，大学开始开设网上课程，这让很多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希望在今后几年，巴基斯坦可以大大增加大学生人数。

几年前，巴基斯坦政府开始推动公民身份证系统上网，建立民众的身份信息数据库，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现在，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希望利用数据平台，把身份证号变成个人纳税号，以改进纳税工作，使它更高效。

银行方面，巴基斯坦的银行网点覆盖率不到 15%，因为在各地建立分行、雇佣合适的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现在有了技术支持，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支付平台，民众只要有账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获得银行服务，哪怕是处理很小的业务，解决了过去只能依靠传统方法才能处理金融事务的问题。在非洲，没有银行网点，只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开展银行服务是很成功的，而且这样还可以使那些原本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也可以进入到金融市场，参与金融活动。

电子商务也正在对传统商店提出挑战，它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建立起自己的销售业务，而不必进行大量资本投入。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青少年，都在开发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并且从中获得丰厚报酬。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工业，有很大的创新潜力，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和创新，可以实现更有包容性、可持续的发展。

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尼古拉斯·霍普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尼古拉斯·霍普

中国在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关系再平衡。我曾参与一项关于中美企业创新比较的调研项目，我们看到通过推进技术创新，确实会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要确定到底是哪项技术真正促进了经济增长却很难。例如，中国“十三五”规划里有很多科研项目，可以整体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但是不一定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在中国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里，重大科技项目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以及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项目包括：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以上列举的这些项目看上去是很有吸引力的，是雄心勃勃的，但是以中国当今的财力、能力全面落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认为要做出选择，要确定各研究项目的投资数额以及资金来源，而且不能由政府单打独斗，要把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和资金

也一并调动起来。

在科技创新和创业等方面，政府都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对科技研发进行资助。一项科技创新从理论研发到市场化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国家决策来平衡政府和私营投入，也需要制定优先级目标，也就是确定在哪些项目、哪些领域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

中国“十三五”规划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型阶段，而其中最重要的困惑就是寻找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希望通过提倡“万众创新”激励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企业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与中国不同，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私营部门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如何能够促进创新？或者说激励创新的具体措施有哪些？应该有一个政府的保证，能够保证像专利申请、研究报告等创新真正能够获得褒奖。

中美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谁才是有更好风险抵抗能力的国家？现在有些人批评中国一直在模仿而不是真正的创新，但其实成功的商业模仿也是降低风险的重要路径。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百度，虽然最早可能是以模仿起家，但他们现在很多做法早已不是模仿，而是非常具有创新性了。

研发新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也需要政府做界定，需要政府在经济利益和环境代价之间做权衡和取舍。对于科技研发者而言，成功的奖励是什么，失败后的代价又会是什么？在美国，是鼓励试错的。因此在美国人看来，与其固步自封、小心翼翼，不如大胆去做，因为错了也没关系，可以重头再来。

可能有的人认为，模仿成功的案例承担的风险会小一些。有一个说法，说美国硅谷的模式正在被大量地在全球各地复制，我不认为其他国家能够复制这样的奇迹。我认为，创新来自于世界各地，中国的创新做得也非常好。硅谷是基于互联网的奇迹，通过网络连接，在全球各地打造了一个个产品和服务的链条。由于中国互联



网的飞速发展，目前硅谷的公司开始面临来自中国公司的正面挑战。

最后讲一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促进和扩大消费，刺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而不是一味地投资。中国政府为实现供给与消费的平衡，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出台了相关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政府通过提高生产力，解决低质量的过度供应；通过淘汰低端过剩产能，推动中国经济由“大而快”向“强而优”转变。当然，这个转变过程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仓促行动很可能会出乱子，像所谓的僵尸企业（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生存和经营的企业），需要慢慢地被清除。

最后我想引用几年前我讲过的一段话，这是与朱镕基总理在 1997 年说过的一段话。我说，所有的项目贷款须由银行决定，如果做错了决定，行长就应辞职，必须有一个系统来保证中国的银行还是有希望的。如今 20 年过去了，这段话依然很重要。中国“十三五”规划非常强调创新和科技研发，这就需要有一个金融的过滤器，来淘汰坏的项目支持好的项目，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是如何鼓励地方官员通过直接投资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不必夸大“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

■ 张礼卿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张礼卿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讨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是在讨论世界经济。接下来，我就中国经济增长提几个观点。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增速放慢是一个必然趋势。由于人口结构和储蓄倾向的改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持续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2015 ~ 2020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大概是 6%，之后可能会降到 6% 以下，也有人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很快会降到 5% ~ 6%。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很重要，因为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增长目标，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非常重要。三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对于深化经济改

革的战略方向给予了明确表述，并提出了很具体的措施，中国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因为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推动制度性变革，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第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中国确实有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但从这两年的实行情况来看，困难重重，可能一些过剩产能还在增加，有些地方的杠杆越去越高，库存也在不断增加。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僵尸企业的处置确实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一些地方不能果断处置。这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完善、加大技能培训等措施缓解僵尸企业处置带来的问题，而不是直接放弃处置。另外一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来进行。过去几年里面，一些产能过剩是错误的产业政策造成的，所以要审慎地运用产业政策，更多地让市场力量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

第四，应适当地进行需求刺激。这一轮经济下行，不仅仅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也有周期性冲击。因此，需要适当地使用需求管理政策，有以下政策措施可以使用：一是可以全面降低税费，中国企业确实面临比较重的税负。二是可以扩大财政支出改变结构问题、改善基础设施。

三是可以适度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四是尽量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允许人民币适度贬值。当然，同时可以加强资本管制，避免资本过度外流。五是加强技术创新，努力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这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关键。六是推进和扩大双向对外开放。这里我想特

别强调的是，要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非常成功，使中国的制造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现在服务业这个领域也可以继续开放。

谈到“中国模式”，很多人会过多地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不能低估。应该说“中国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改革的结合，而“华盛顿共识”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全部自由化。



相信开放二十年,中国的服务业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同时,要继续积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最后,前面的讨论中,很多人都提到了“中国模式”和“华盛顿共识”。对此,我想说的是,不要夸大“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区别。谈到“中国模式”,很多人会过多地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不能低估。仔细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模式”的主要部分,政府引导只是另外一个方面。应该说“中国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改革的结合,而“华盛顿共识”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全部自由化。我跟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 (编者注:“华盛顿共识”首倡者,著名经济学家)也有过多次讨论,他总结的方案并不是更多地强调市场,比如他很赞成资本管制,反对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这些是很多人忽略的。

中国与新兴经济体 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 陈兴动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法国巴黎证券 (亚洲)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陈兴动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处于非常态,也就是老常态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新常态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正处于转型之中。

我有以下六个主要观点。第一个观点,世界经济复苏慢于预期。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增长差。第三个观点,2016年的中国经济有可能完不成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第四个观点,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6.5%~7%,现在经济增长已经掉到了6.5%以下,我个人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五个观点,中国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全球未来的投资机会在中国,许多跨国公司也把中国作为未来最大的投资目的地。第六个观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在五个方面。下面我就以上六个观点中的三个观点,展开来讲。

首先,展开讲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增长差。第一个增长差,就是总需求的增长慢于总供给的增长。中国宏观统计数字表明,总需求的增长是下降的。2016年1-7月份中国出口增长下降了7.3%,2015年出口增长下降了

2.8%,所以中国出口增长是在加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2015年增长10%,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8.1%,速度也是下降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的替代,增长速度比去年稍慢一些,没有实现正增长。正是因为以上原因,中国总需求的增速超过了总供给的速度。2016年1-6月份中国经济增长6.7%,2015年1-6月份增长约7%,下降了0.3%。

第二个增长差,中国的增长出现了双边分化,服务业增长快于工业增长,工业增长现在处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6%,而服务业增速达到7.3%,服务业和新经济的增长,不能完全抵消传统产业的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趋于下降。

第三个增长差,民营投资增长大规模下降,国营投资增长在上升,可是民营投资占中国总投资的60%以上,所以想靠国有企业拉起国家投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第四个增长差,从现在的货币指标来看,从2015年10月份开始M1增长了25.4%。M2的增长只有10%多一点不到11%。社会融资规模(简称社融)增长11%左右,在下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全社会的信用总量,也就是银行对政府的贷款,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银行对居民的贷款,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这四项加起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20%。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混沌状态,令人看不清。

其次,我展开讲第四个观点,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民营投资大幅度下降,这是中国经济下滑的最重要因素。民营企业不再关注投资实体经济,这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思,也必须深思并且积极寻找解决方案。第二个原因,政府不作为情况比较严重。比如,财政支出提高了,但是支出的钱并没有用掉,变成了财政存款。第三个原因,出台了减税降费政策,但并没有在实体经济中贯彻落实。第四个原因,政策的有效性大规模下降,货币政策边际效应看不出



来。所以中央银行都提出来，现在的货币政策不能靠货币政策本身，必须跟其它政策共同作用才能起效。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一样。第五个原因，正常的财政预算赤字加上预算外的财政赤字，加起来大概有差不多 8% 的 GDP。但是这么大的财政赤字，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最后我展开讲第六个观点，就是中国五个方面经济增长潜力。第一，城市化发展。我认为中国过去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推动大都市圈的发展。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推进大都市圈、城镇化、一小时交通圈，照此对中国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整合，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第二，平衡各地区的发展。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现在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是贵州、云南等地区的 3 倍多。把这些沟壑填平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第三，中国工业化升级潜力巨大。现在国家对此非常关注并积极提倡，比如装备制造业升级、消费升级等。现在中国的工业消费品增长，大大落后于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又大大超过了现在的供给能力。第四，创新导致的新经济和服务业的增长。

第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上五个方面，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力所在。



F20: 金融创新应促进增长力

发展期货市场，应对全球性挑战

利奥·梅拉梅德，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终身主席

48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李东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49

互联网发展对金融的影响

珍妮·希普利，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51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及其面临的风险

宋敏，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52

发展期货市场， 应对全球性挑战

■ 利奥·梅拉梅德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终身主席



利奥·梅拉梅德

期货市场也是创新的受益者。在过去的 34 年间，大家改变了期货的方法和标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972 年的时候，期货市场还是以农产品为主导，我建议应该发展金融期货，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论，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不是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只是一名律师。但最终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支持了我，认为我的建议很好，他给予我的信任坚定了我的信心。后来，大家逐渐发现我提出的金融期货确实非常有用，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工具，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此后，金融期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

1991 年，我所领导的交易所从“公开喊价交易”转向“电子交易”，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当时，大家都习惯了交易大厅里穿着红马甲的交易员大声叫嚷着、做着手势来进行交易。当我提出要改变这种方法的时候，大家并不是那么支持，因为事实上相当于把交易员的饭碗给砸了。他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两百年都习惯了这种公开喊价式的交易方式，但我知道世界正在不断地向自动化、电子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科技会取代很多传统做法，它正在并将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

现在中国的股票市场出现断崖式下跌，面临一些困难，有人将原因归咎在期货上，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很多方面都能证明这个论点是错误的。我在担任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ME) 主席期间，就见证了 1997 年的股市崩盘。当时美国首次触发熔断机制，一天之内道琼斯指数暴跌 7.18%，大家也说是期货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1997 年的金融危机是从日本开始的，然后蔓延到了中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最后席卷全球。但当时的日本甚至还没有期货市场，市场崩盘的新加坡也没有期货市场。事实上，期货只是提供了一种商业工具，反映了市场的真实情况，当市场上有泡沫要破裂的时候，期货就会告诉全世界这个泡沫要炸了。比如 1997 年时，货币贬值的情况在全球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2008 年时，美国出现了地产泡沫，最后泡沫破裂，对美国的市场和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但这不能责怪期货市场，因为它仅仅是如实反映了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今的期货市场在不断变化，期货交易也在持续增长就证明了这一点。金融期货推出后，它每天的交易量从 1997 年的还不到 10 万手，到 2016 年已经达到了 1900 万手，这个增幅实在太大了。同时，全球期货交易市场蓬勃发展，G20 的 20 个成员国中，有 18 个都有期货市场，并且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发展。

商业企业也必须使用期货，因为期货是比较成熟、比较复杂的金融工具，可以给企业带来用少量资金取得放大效果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期货就像是一个大型保险公司，当商业效果与预期出现偏差时，期货市场可以进行对冲。如果没有这个保险公司在，企业就必须把大量的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现在企业大概还是需要留一些救急资金，但不需要将大量资金闲置不用，可以把这些钱用到更有效的地方去，比如盖工厂、修路等。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最悠久的期货交易所，它还在不断创新。中国也需要继续发展期货市场，没有期货市场就很难发展实体经济。

现在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应该携起手来，把世界重新团结到一起，要做到这一点，期货市场是必须的工具之一。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 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 李东荣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东荣

近年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普惠金融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扩大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14 年全球范围内仍有约 20 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国际金融公司 2013 年发布的企业融资缺口报告显示，全球约有 2 ~ 2.45 亿企业缺少基本的信贷服务，其中超过 90% 是中小微企业。全球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有 3.2 ~ 3.9 万亿美元。如果通过有效的普惠金融创新，将这部分群体和中小微企业以适当的方式纳入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不仅有助于实现金融公平和社会稳定，还能够提高经济主体对增长过程的参与程度，破解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约束，释放巨大的市场活力和经济潜力。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自 2005 年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全球普惠金融实践日益丰富，形成了很多典型经验和标杆做法。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根据世界银行在普惠金融指标上的最新数据，中国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特别是账户普及率和储蓄普及率等指标，甚至显著优于 G20 国家的平均值。

2016 年 1 月，中国政府首次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将发展普惠金融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使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国际中上游水平。

当然，中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也面临着服务不均衡、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性不足等一系列全球性难题，需要更努力地去工作。特别是通过更积极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有效的金融创新，去解决这些共性难题。

即将在中国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将讨论通过“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鼓励各国建立可行的法律监管框架、数字基础设施和消费者保护体系，依托先进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预见，在全球范围内，将会加速形成一个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有效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使经济金融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

下面，结合中国发展数字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的经验，就如何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要培育数字普惠金融新理念。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和服务理念，真正关注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偏好。要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建立服务标准，加强风险提示等多元化手段，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透明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应该通过友好的操作界面，实时的在线客服，规范通俗的合同条款手段，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易于操作，便于知晓，避免因弱势群体缺乏数字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产生新的金融不公平。

第二，要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创新优势。要运用云计算技术，有效实现业务系统的弹性扩展，更好地适应小微客户单笔小额海量交易的特点。要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移动金融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场景的紧密结合，实现小额汇款、小额支付、公共缴费等普惠金融服务的实时化、随身化和移动化。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技术等新兴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



创新应用。

第三, 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当前, 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服务链条各个环节的创新融合, 在提升了服务效率的同时, 还可能产生技术风险与业务风险的叠加效应。因此, 要充分考虑到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群体等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在金融知识储备、风险识别、终端技术等方面可能存在的认知不足等问题。

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同时, 还应该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机构内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风险治理体系, 把握好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适度平衡, 使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处于可管、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在这个过程中, 要特别注重利用数字技术改进普惠金融监管的流程和能力, 可考虑建立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试点、产品实验、压力测试、差异化监管等创新监管机制。

第四, 要构建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环境。要坚持普惠金融服务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规则, 着力破解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约束和制度瓶颈, 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要不断完善支付清算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体系, 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能够安全、可信、低成本的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特别是在一些金融服务匮乏的边远地区, 要依法合规使用传统银行数据以及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公用事业缴费等新型的数据,

建立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 培育从事普惠金融服务的市场化大数据征信机构。要明确服务提供者在客户权益保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运用数字技术建立远程的客服、信息披露、在线投诉、争议处理等机制, 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要广泛利用多元化渠道, 针对性开展普惠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 提高金融消费者的数字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模式、新工具, 其发展的时间还不长, 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交流借鉴、共同推荐, 相信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一定能够将全球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互联网发展 对金融的影响

■ 珍妮·希普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什么是金融的本质? 我想就这个问题, 分享几点我的看法。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互联网的发明,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也想亲眼看到互联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它的潜力是什么。

第一, 可以重新塑造金融的本质。我非常看好数字金融、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如果能够把一个人群的收入及其消费习惯、投资偏好等, 就是人力结合资本形成一个交叉点。而这个交叉点正好是实体经济的核心。

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很多科技创新, 他们在利用数据增进信任, 释放潜力。中国有两三家互联网大公司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 他们收集和很多消费者的信息和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 基于信用, 在很短的时间内, 最快几分钟就能掌握一个人的信用额度。当然, 其中有一些风险, 但是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创新发挥作用, 不能因为可能带来风险, 就管得过死, 不让它发展。我们当然要有风险意识, 但是我们更应该让创新先行、监管后行。所以, 我非常赞同中国把相关问题作为二十国集团会议的议题提出来。

第二, 关于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e-WTP, 全称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的概念。2016 年 3 月中国阿里集团提出用互联网和技术的力量, 建立一个政府、民间、企业合作的新平台, 让全世界中小企业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可以自由公平开放贸易的平台。过去的一二十年, 全球化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 但近些年人们发现贸易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世界贸易组织 (WTO 简称世贸组织) 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阿里集团认为 WTO 是为大企业准备的, 为政府谈判准备的, 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 完善补充 WTO, 让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e-WTP 就是这个新机制、新平台。“e”代表互联网, 互联网可以让全球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联系起来。要让贸易更加自由、更加快捷便利, 需要打造一个全球互利、互惠、互认的一个制度, 其中互认尤其重要。因为不可能中国一套规则, 美国一套规则; 阿里巴巴一套规则, 亚马逊一套规则。这样显然是不行的, 规则必须是互认的, 标准必须是统一的。希望我们不要像世贸组织 (WTO) 那样, 耗费 20 多年的时间来谈制度。

第三, 关于普惠金融的概念。普惠金融是以小额、分散为特征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涉及很多议题, 在全球经济当中, 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进一步便利化。在推进普惠金融的同时, 也要注意管理相关的风险。很多时候, 一些大型的机构其实没有足够的一线人员去接触小微企业。因为这些小微企业, 必须有专业人员给他们做金融基础知识的宣讲或培训, 以保证这些小微企业能按期还贷。普惠金融是通过网络、数字、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 把金融服务惠及那些过去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贫困地区或小微企业。我觉得参与国际金融论坛 (IFF) 活动的普惠金融相关方, 可以更明确地提出落实普惠金融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而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讨论。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及其面临的风险

■ 宋敏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宋敏

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全球是领先的，具体讲应该是领先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中国内地的互联网金融更是远远超过了香港特区的水平。

一、中国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能领先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因，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比较低，有很多金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消费者融资问题等等，所以中国相比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讲，有很大的长尾巴效应。所以中国金融的客观需求，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那么快，也有金融监管不严、不到位甚至可以说过于宽松的原因。第三，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比较快，特别是电商。中国的阿里巴巴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电商，超过了美国的易贝 (eBay)。所以基于中国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也发展得非常快。互联网金融需要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在中国这个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以电商为主的，不是传统的实体经济。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特别是阿里金融服务，比如阿

里小贷、支付宝、余额宝等等一系列基于互联网手段的金融服务，其实刚开始是因为中国的信用卡体系不发达。为了撮合买方和卖方，需要建立一个中介或叫第三方平台，买方不把货款直接交付卖方，而是先把钱放到第三方平台。买方收到卖方货品并表示满意后，第三方平台才把之前买方的货款交给卖方；如果买方对货品不满意，第三方平台就不把买方的货款交给卖方。阿里就是这个中介或第三方平台。

在发达国家信用卡体系比较发达，民众接受度高，刷卡消费早已成习惯。而中国因为信用卡体系不够发达，在中国人还没有形成刷卡消费习惯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就飞速发展起来，于是网络扫码支付打了个时间差，替代了刚刚在中国萌芽的刷卡支付方式，并迅速在全中国普及，互联网金融业因此就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反而是因为信用卡不够普及实现了弯道超车，直接越过信用卡支付阶段进入了微信、支付宝等网络支付阶段。现在提倡创新，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创新，它并不是监管不到位导致的。

二、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宽松将面临的的风险及应对之道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非常快，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监管确实是比较宽松的，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如果监管持续宽松会出现很多问题。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目前大概有近 4000 家 P2P 平台，其中出现问题的有将近一半，包括很多欺诈。这些出问题的 P2P 平台涉及上百万投资者，遍布中国各个地区，已经形成了全局的系统性风险。这就是监管不严造成的后果，因为很多出问题的 P2P 不只是系统性的压力，而是欺诈。很多被骗的投资者都是很小的投资者，对金融知识知之甚少。

中国的现状是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但是监管手段没有跟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在逐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但是现在监管的趋严更多还是局限在传



统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互联网金融，采取的还是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我觉得这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的金融业态，它采用的是互联网这一新的手段，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和 AI 技术等，这些都是新技术。在这些新技术驱动下产生的互联网金融，显然也需要新的监管手段。如果我们还按照原来的监管手段，一个季度去查一查它的报表和账目，显然是不行的。互联网金融的数据是快速变化的、多方位的，也是非结构的。所以，我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必须要用互联网、大数据、AI 等技术手段，应该使用全方位的动态监控体系。

但是中国现在的监管手段是滞后的，因为我们的监管者很多都不懂这些新技术，监管者是滞后于新技术发展的，这就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面临的严峻挑战。所以我认为，一方面监管者要加强学习，另外监管者要和企业合作，让更多的市场手段参与监管。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网络科技公司，可以通过大数据、AI、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提供监管服务。

我想这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在官方的体系外，建立一个跟民间结合的行业自律性监管体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也可以不依赖市场，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大数据分析公司、AI

公司，可以监管这些公司，让这些公司再监管新生的互联网金融生态。这就是新金融带给我们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面对，因为这是金融的未来。

世界经济现状 以及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济指标都说明，脱欧造成的影响不是仅集中在欧洲或者英国，而是会扩散到全世界，将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深远影响。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化世界里，我们更需要国际合作，而英国脱欧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下行的风险。虽然世界其他地方也难免受到脱欧影响，但最大的风险无疑将集中在发达的欧洲经济体。所以，我建议不要仅从经济的角度还要从政治和历史的角看待脱欧问题，因为脱欧可能是欧盟解体的一个开端。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但我真心担忧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未来。20世纪60年代，我在英国读研究生的时候，英国就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欧盟的前身。那时候，英国国民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热情非常高，我因此特别希望亚洲有一天也能够像欧洲一样进行一体化、加深合作。

我讲这些过去的事情，是因为我想表明，一直以来我都由衷地赞成、支持欧洲一体化，并盼望亚洲也能开展一体化进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共发生过三场大战：法国普鲁士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欧洲享受了6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主要归功于欧洲的一体化。马歇尔计划也就是战后重建计划（官方称欧洲复兴计划），以及欧洲的一体化，是欧洲实现战争后和平的最大贡献者。欧盟有非常伟大的领袖，像罗伯特·舒曼等。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防范冲突，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促进发展和繁荣。1951年，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六个国家签订《巴黎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因为煤和钢是战争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1967年，以上三个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非常遗憾的是，英国脱欧有可能终结欧洲一体化进程，而且将可能长期影响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今天我要讲两点，一个是世界经济，一个是英国脱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世界经济增长疲软，预计2016年增长3.1%，2017年增长3.4%。自从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80%，2016年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放缓，商品价格下行，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放慢。新兴市场经济低迷以及金融环境紧张，更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通过调整宏观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和结构性改革，应该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有哪些经济工具可以发挥作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凯恩斯提了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我们当下也需要一个新的凯恩斯，需要一个新的思想家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提出新的解决办法。2015年英国经济增长是2.2%，预计2016年是1.7%，2017年是1.2%。英国从欧盟脱离，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认为脱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些英国人和欧盟的一部分人希望可以加快脱欧的进程。目前所有的经

F20: 促进金融稳定与合作对话

世界经济现状以及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55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以欧盟为榜样建设东亚共同体，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	56
鸠山由纪夫，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	
新世界需要新领导、新策略	57
珍妮·希普利，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中美欧	58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欧洲50集团主席、法国前财长	
风险越大冲突越大，越需要合作和对话	60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以欧盟为榜样建设东亚共同体， 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

■ 鸠山由纪夫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

促进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牢记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会给无辜百姓带来痛苦和不幸。

然而，至今为止世界依然战火不断，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频发的武装冲突等。恐怖主义和恐怖袭击伤害了巴黎、布鲁塞尔、法国尼斯、孟加拉国达卡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无辜百姓。关于反恐，世界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恐怖分子的袭击激起轰炸反击，轰炸又激发恐怖分子报复式恐怖袭击。我们绝对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我们也反对伤害无辜百姓的轰炸。亚洲也面临很多冲突和紧张局势，比如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以及越南、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就中国南海一些岛屿的争议。我们应该通过对话而非暴力的方式积极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升级。我们需要努力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建立伙伴关系，最终结束冲突。

我认为东盟国家与中日韩可以共同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这也是我在 2014 年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年会上提出的一个构想，而欧盟应该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楷模。我们知道，欧盟现在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比如希

腊金融危机、难民涌入、英国脱欧等。但无论如何，欧盟都值得骄傲，因为它是全球唯一成功的和平共同体。所以，虽然欧盟仍存在很多缺陷，但它仍然是东亚共同体的表率 and 榜样。

为了实现东亚共同体，东亚地区的国家需要创建一个对话平台，促进教育、文化、经济、环境、能源、抗灾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5 年底，10 个东盟国家宣布建立东盟共同体，如果再加上中日韩就等同于形成了东亚经济共同体。

我认为 21 世纪的世界各国，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更要警惕战争、反对战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世界各国应坚持开放、避免建立像海关联盟之类的壁垒和鸿沟。我们也需要提高大家的共识，确保每一个行业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开放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战、和平的目标。

中日韩可以成为东亚共同体和平对话的核心平台，为此我建议成立九州的东亚和平理事会和冲绳的东亚共同体理事会。我认为九州东亚和平理事会可以成为朝鲜南北问题的矛盾化解中心，当然要让朝鲜参加进来一开始肯定有难度，但我认为可以先在文化、体育、环保或能源等领域进行交流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友谊和信任，最终让朝鲜参加这个和平理事会。二战末期在冲绳爆发的冲绳岛战役，除了美日军人伤亡惨重外，岛上平民也丧生达十万余。二战后，冲绳岛成为了美军军事基地。我建议在冲绳建立东亚共同体理事会，成为促进各方合作的常设磋商机构，其终极目标是让冲绳岛最终实现无军事化，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应努力帮助冲绳摆脱军事基地的历史。我认为两个理事会可以对九州和冲绳岛去军事化发挥重要作用。

我深信，东亚共同体可以成为一个领先的、开放的、合作的集体，助力东亚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和平，并将经济增长、和平惠及世界。全世界再也没有冲突和战争是我们共同的终极目标，“一带一路”倡议、F20 倡议等等都将为实现这个目标发挥重要作用。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欧美和东亚、把全世界团结到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个真正的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新世界 需要新领导、新策略

■ 珍妮·希普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20 年前由精英掌握信息和话语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下普通老百姓也可以获得几乎与精英同样多的信息，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对还是错，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并发声。

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首先必须要让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是主人，政策是有益于他们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将会出现大量不满情绪，最终导致政策流产。所以要让所有老百姓认为政策是为他们服务而不只是为少数精英服务的，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世界永远需要有领导风范和领导能力的人来带领，所以如果选出的领导不具有这种水平，要么指引的方向错误，要么一盘散沙不能聚集力量。领导人包括 G20 的领导人汇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当然会有正式的议程，然而我观察发现那些非正式的议程也非常重要，而且往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换句话说，让领导人汇聚在一起交流很重要，而让交流变得活跃、畅所欲言更重要。而做到这一点，才

能更加激发领导人的才华碰撞出火花，有力推进重大事项的解决。

再次，不管是政治的还是财政、金融的问题，我们拟定解决方案，总是习惯参照惯例和历史经验，然而世界日新月异，我认为应该更多考虑事物的最新变化。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领导人的因素，比如现在欧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是女性。我感觉，她们做事比较专注集中、比较务实，不把精力分散到无谓的互相指责或领土纷争中。作为一名女性领导人，我认为女人处理一些事情，结果往往是与男人不一样的。

无论是财政、金融等领域的领导还是全球领导人，我都赞成多样化。比如“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挑战，因而需要各类才能的领导。不管是南南合作还是北北合作抑或是南北合作，只要合作参与方加强交流和了解，包括了解不同文化、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制度等，就能够合作成功、共创美好未来。“一带一路”不仅是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而且是世界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机构，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敞开大门，欢迎加入。

我们所有人，不管在哪个领域从事哪种行业，都不能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要将眼光放长远，要勇于创新，拥抱新世界。

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 中美欧

■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欧洲 50 集团主席、法国前财长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全球化现在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美国,特朗普竞选中很多选民提出反对自由贸易;在欧洲,极右翼党派势力正在迅速崛起。

过去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说明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黄金价格是体现这种信

心的指标之一。近些年来,黄金价格不断走高,经常账户严重不平衡,出现越来越多的债权债务,既有公共债务也有私人债务。而且我们的货币政策尽管越来越适应低利率的情况,但是没能促进更多更好的投资,反而出现了动荡不安。比如油、气、钢铁和农产品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上下起伏,导致经济不稳定。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全球资金流动量非常大,但经济依然呈现下滑趋势,唯一的解释就是缺乏信心。因此,我们更应该积极促进经济体间的合作。而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主要

是美国、中国和欧盟三大经济体。

首先讲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2015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的驱动力是美国的 2 ~ 4 倍。现在中国把经济工作重点放在促进国内消费上,是非常正确的,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好处。中国还表示将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取得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相同的地位,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认可,但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比如在中国内部,钢铁、煤炭等领域需要进行重新调整;金融领域,有影子银行的风险,还有理财、保险产品对客户的承诺不兑现等问题,这些都是对金融体系的威胁。相信中国政府了解这些问题并且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取得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相同的地位,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货币和金融政策越复杂就越难执行,一方面需要比较低的利率来支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套利的风险。资本大量流出将给人民币带来下行的压力,还会产生其他溢出效果,当然这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密切相关。总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世界经

济以及中国贸易和金融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谈美国。因为美国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目前美国的失业率较低,大家感觉美国的经济还不错。但这是因为美联储在用政策支持较高的资产价格,这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美国利率上涨,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资本大量流向美国,造成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动性下降?会不会增强汇率市场的紧张?所以美国经济不仅影响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



最后说一下欧洲。欧债危机之后,大家又开始关注欧盟。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国举行了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脱欧阵营以微弱得票优势胜出,英国成为了首个投票脱离欧盟的国家,这给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变数。我认为,英国脱欧不是一件好事,不仅会给英国带来负面影响,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2016 年中英两国双边贸易额 738 亿美元,下降了 18.9%,对企业的相关投资决策和消费者信心,都有一定影响。

英国脱欧对欧盟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们之间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紧密相连,比如可能会引发政治方面的潜在危机。由于欧洲央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金融市场的分割化稍微改善了一些。现在欧盟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怎样跟英国进行脱欧谈判、如何应对脱欧带来的新挑战,以及怎样有力打击恐怖主义、妥善解决移民问题、维护泛欧的安全等。中国政府表示,希望看到欧盟团结和稳定。团结稳定的欧盟有利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脱欧释放了不好的信号,这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倒退。

世界各国的主权当然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如果相信全球化并想继续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就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信心

的回归,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多边组织以及像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这样的平台和智库多做工作,促进理解、交流与合作。

风险越大冲突越大， 越需要合作和对话

■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我主要讲四点，然后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点，风险越大冲突越大，越需要合作和对话。

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源于不理解或误读、误判。这就需要多边或双边机构以及像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这样的平台，积极促进各国、各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点，对于当今世界来讲，稳定前所未有的重要。

我们与会的所有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早已习惯于稳定的环境，而且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将面对人生第一次不稳定。我所说的

稳定包括经济金融的稳定，其与政治的稳定性紧密相关。

稳定其实是一种公共产品，从经济学角度讲，外部性的意思就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或社会的影响。如果产生的影响是有益的，称为正外部性，反之则称为负外部性。例如，一个国家如果发生稳定问题，也

就是发生动荡，会溢出到其他国家，而且这种负外部性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我认为，互相之间的理解对于稳定是特别重要的，只有通过对话、交流才能实现稳定。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一部分欧盟国家表示厌恶、愤怒，因为英国参与讨论欧洲一体化近 30 年，现在突然要退出，实在难以接受。另一部分欧盟国家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对话合作，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坚持对话与合作的最重要主张者，她一直在积极促进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法国总统奥朗德恐怕主要是希望尽快推动脱欧的过程。

欧盟国家的两种态度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给予英国太多理解和支持的话，恐怕会有其他国家效仿英国脱欧；如果很决绝地让英国脱离欧盟的话，又恐怕会影响欧洲的稳定。米歇尔和英国的约翰逊脱欧立场很坚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意大利总理伦齐都希望管理好脱欧的过程，保持欧洲稳定。

第三点，我想说一下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就与叙利亚等国家有很紧密的联系。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感觉俄罗斯有可能会去挑战北约，比如说在波罗的海或者在乌克兰。所以，我觉得要加强对话，而不是把门关上，拒绝交流。因为

不明确的、带暗示的交流，容易造成误解。虽然我个人力量比较弱，但我愿意跟俄罗斯进行沟通交流。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银行，欧洲的银行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修宪公投是意大利政治的分水岭，如果政改

方案被否决可能会有多家银行倒闭。银行与监管当局需要耐心地对话和交流，要积极协调解决矛盾，要尽量保证金融的稳定。

第四点，我想讲一讲欧盟。

欧盟现在处于很脆弱的状态，跟英国脱欧有一定关

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源于不理解或误读、误判。这就需要多边或双边机构以及像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这样的平台，积极促进各国、各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系，但也不全是因为英国脱欧。对欧盟的不满情绪其实在近些年来一直有所增长，英国脱欧只是使这种不满情绪更加激化和凸显了。所以，我认为应该重新设计完善欧盟体系，要认清欧盟建立的宗旨和目标，要促进欧洲各国的紧密团结。同时我们也要认清欧盟面临的主要问题，比如难民问题，它严重动摇了欧洲的团结。

欧盟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官僚主义及其官僚体系。欧盟其实就是一个由官僚掌管的、自上而下的、精英构想出来的机制，民众从来没有将其视为一个民主的选择。所以，欧盟官僚觉得他们不用向任何人负责，也不必受成员国政府的太多影响，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缺乏问责。比如欧盟现行的很多法规都很难理解，也很难执行，却无人问责法规制定者，也因而导致一些欧盟领导人缺乏领袖应有的才能。

我希望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希望看到在脱欧谈判中有才华的欧盟领导人，希望欧盟领导不拘一格。

F20: 支持丝绸之路倡议与行动

国际金融论坛（IFF）发起丝路国际联盟倡议	63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丝路国际联盟和 F20 倡议将重塑金融本质、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	65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AIIB）行长	
期待中国继续在开放的道路快速上快速发展	66
图尔基王子，国际金融论坛（IFF）基金理事会联合主席、沙特国王基金会 CEO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67
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 G20 事务原协调人	
“一带一路”在促进沿线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密切该区域国家间的关系，增强合作与互信	69
鸠山由纪夫，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	
丝路国际联盟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70
珍妮·希普利，国际金融论坛（IFF）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加强国家金融顶层设计，关注“一带一路”金融的现在与未来	71
陈云贤，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广东省原副省长	
中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73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欧洲 50 集团主席、法国前财长	
“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之一	74
于洪君，国际金融论坛（IFF）执行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关于丝路国际联盟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76
马儒沛，国际金融论坛（IFF）执行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关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的几点看法	78
余利明，中国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国际金融论坛（IFF） 发起丝路国际联盟倡议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我十分荣幸宣布国际金融论坛（IFF）今天正式发起丝路国际联盟（SRIA）倡议。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大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然而，受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信仰等多重因素影响，“一带一路”还有待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同和积极参与。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全球发展已迈入关键的临界点，有必要结合“一带一路”，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通过深化交流合作、沟通协调，促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以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基础，促进各方对“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互利和共赢”核心内涵的认

同，并形成共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各国经济增长，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和企业领袖，为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先导和核心作用，共同倡议发起丝路国际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希望通过联盟搭建国际共享平台，深化民间交流合作，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创新、文明对话等领域沟通协调，促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让世界参与“一带一路”，让“一带一路”推进国际社会和谐发展，共进共荣。为促进这一步目标实现，我们共同倡议如下：

一、建立丝路国际联盟，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和企业领袖共同参与，统筹运用国际智库资源，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通过推动沿线重点国家战略合作，形成国际公共外交和战略合作网络的主体框架，以发挥协同效应，形成协作合力；

二、建立“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常态化对话、人员交流互访与合作研究机制。以联盟为平台，建立研究成果交流、共同发表成果、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

专家学者互访、合作研究等机制，通过资助和聘请有关国家智库和学者开展研究，及时反映沿线国家的困难、问题、期待与利益诉求，提出共同解决对策方案等；

三、以国际金融论坛（IFF）和联盟为平台，定期举办丝路国际联盟峰会。分享各成员国发展理念及经验，就“一带一路”建设和相关国际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力争打造成为沿线国家政产学研各界对“一带一路”进行综合对话、交流、合作的权威平台；

四、通过联盟，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社会、全

当前全球发展已迈入关键的临界点，有必要结合“一带一路”，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



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合作的多边沟通渠道与促进机制。并根据合作需要，积极推动建立民营丝路金融机构，以支持“一带一路”的实施；

五、联盟将以国际金融论坛（IFF）为依托，设立丝路国际联盟全球理事会，建立会员机制，常设秘书处，负责协调和主持日常工作。

我们相信，丝路国际联盟的发起和创立，将是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进一步认同和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里程碑，将为促进世界全面可持续发展，增强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在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发挥积极的影响。

2015年9月，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会聚纽约联合国总部，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并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议程）。议程共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有8个目标直接与“一带一路”有关，它们是：1.技术的可获取性；2.可持续经济发展；3.建立健全的基础设施；4.让城市更包容、安全和可持续；5.抵抗气候变化以及它的影响；6.保护海洋和海洋资源；7.可持续地管理森林资源；8.停止和逆转土壤的退化

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弱。

我希望丝路国际联盟（SRIA）可以有力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让丝路国际联盟成为一个高瞻远瞩的平台。

丝路国际联盟和 F20 倡议将重塑金融本质、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

■ 金立群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



金立群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旧严峻。应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提振信心，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打造多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日益得到亚洲及其他地区领导人的支持。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战略，其目的是与亚洲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从而促进全球繁荣与合作，以此为目的而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新兴的多边开发机构，是在国际准则下按照国际多边机制的要求建立的开放、民主、廉洁、高效的多边国际金融开发机构。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凭借经济金融比较优势，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强贸易交流、探索产能合作、促进经济增长。

作为一个独立透明、非官方，立足于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外交与战略智库平台，国际金融

论坛（IFF）成立13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着眼于加强经济金融战略研判，力求为全球财经政要、金融领袖、学界专家们打造一个良好的交流对话平台，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展望未来，国际金融论坛（IFF）将以13年成熟框架为基础，通过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对话机制，打造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值逢中国杭州G20峰会前夕，国际金融论坛（IFF）向全球发出F20倡议，致力于重塑金融本质，推动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创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时代。通过构建F20全球网络，积极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重构和完善基础经济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全面可持续发展。

为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金融先导和核心作用，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和企业界领袖，共同倡议发起了丝路国际联盟（SRIA）。SRIA旨在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建立开放型全球网络，促进各方对“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等核心内涵达成共识，构建丝路民间合作对话机制。

丝路国际联盟和F20倡议顺应时势、秉持开发性原则，是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兴开发银行（NDB）和丝路基金等新兴多边开发机构的有力补充，将极大地促进国际社会、民间交流合作，为后危机时代寻求全球经济增长难题提供崭新视角，意义深远，应得到全球各界的支持及帮助。

期待中国继续在开放的道路上 快速发展

■ 图尔基王子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基金理事会联合主席、沙特国王基金会 CEO



图尔基王子

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应积极了解中国、了解他的宏伟愿景。如果不了解中国，就可能失去重要的发展机遇。

作为国际金融论坛 (IFF) 的联合主席，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中国的经济金融并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令人震撼，我期待中国能继续沿着开放的道路快速前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极大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给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福祉，也是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重要发展机遇。

我当初读书的时候，曾写过大量关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关系的文章，因此我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

家。中国一直以友好、宽容的态度对待世界所有国家，无论贫富亦无论大小。所以，我们应该对于中国的崛起报以欢迎的态度，因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是经济增长。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借鉴，我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能认真学习借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与中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提高双方进出口贸易往来，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从发起到迅速扩大拓展，我们有目共睹。“一带一路”五通的提出，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更是为倡议指引了方向。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绝不是可有可无，它是不可忽视的，是值得大家积极参与的倡议。我建议全球公司、企业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宝贵发展机遇。

在本届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年会上，我还与 IFF 的同事们共同发起了丝路国际联盟倡议，我感到非常荣幸。作为 IFF 的一名成员，我非常希望能通过 IFF 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我的努力和贡献。

我认为“一带一路”绝不是可有可无，它是不可忽视的，是值得大家积极参与的倡议。我建议全球公司、企业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宝贵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 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 何亚非 /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G20事务原协调人



何亚非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许多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展开了对话，探讨合作的新模式、新途径，并带头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配套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现在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 3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合作协议，同 20 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可以说许多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已经有了获得感和参与感。“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和成果超出预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全球视野全面谋划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是从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模式的高度提出的跨区域、跨意识形态、跨领域的全面合作创新举动。

2016 年，是中国执行“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落实的重要一年。首先我们要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有所了解，这样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该倡议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领先世界，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受到各国关注。而世界经济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陷入低迷。推动全球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和新的思路。因此，国际社会殷切期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奉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经济模式失去了光环。2016 年 5 月底，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经济学家联合撰文，对西方国家长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兜售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经济模式，明确提出了质疑，希望大家深刻反思。

第三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势力的相互博弈在加剧，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由于全球化负面因素的集聚，特别是世界各国之间及每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加之中产阶级财富的缩水，从美国大选到英国脱欧，再到法国、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国家代表民粹主义的政党力量不断上升，不少国家对于全球化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充满困惑和忧虑。这影响了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也给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加了难度。

第四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近几年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削弱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所需要的大国合作精神。而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G20 成功应对，首先就得益于大国同舟共济的精神。现在地缘政治的狭隘考虑占了上风，无论是乌克兰危机、中东的乱局，还是南海的紧张局势，都笼罩着地缘政治的阴影。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化。这就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大背景。

为了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破解全球治理的难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出发，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区域合作、国际合作的新倡议，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涉

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贡献。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大国观。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中国绝不可能走历史上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去搞侵略、殖民，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中国今天的强盛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建设“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大国观。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新的发展观。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已经结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正向命运共同体迈进。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地进行，遇到经济危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发展了，就需要带动和带领周边国家一起发展，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地缘政治不是零和博弈，经济发展同样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参与世界市场的开放，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是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中国提倡新的发展观，就是要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建立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经济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新型的国际合作观和国际合作模式。全球化带来国际和区域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而国际合作的模式与全球治理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过去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经济模式，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破灭了。中国提出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合作思路和发展模式，为各国提供了共同发展的新选择，也凸显了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但缺乏资金和技术，更缺乏合适的国际合作模式。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广泛、包容性强，而且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创新机制，推动建立了新的金融机构，为合作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的新型世界秩序观。世界秩序包含了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

面的秩序，是一种全球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和规范。这些要素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中国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强调安全与发展要统筹协调、互为依托。因为中国周边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都存在经济发展和保障安全两大问题或者说两大需求。在东亚、东南亚有一种现象十分突出，就是经济合作框架与安全治理结构背道而驰。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不但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也会在安全领域出现问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中国绝不可能走历史上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去搞侵略、殖民，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通过文明交融、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的民心相通，为各国间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和经济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这是中国希望推动世界秩序发展的方向。

我以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海上航行自由既是安全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有统计表明，每年通过南海和印度洋的船只超过 10 万艘，世界贸易主要靠海运，中国对外贸易 80% 需要经过南海。“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各国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能极大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还可以为缓解地缘政治冲突、解决争端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且包容的，寻求的是互利、合作、共赢，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寻求海洋霸权。

“一带一路”在促进沿线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密切该区域国家间的关系，增强合作与互信

■ 鸠山由纪夫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内涵丰富，涵盖亚洲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并涉及中东和欧洲甚至全球。目前亚洲还没有完全取得政治的稳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差不多每天都有关于恐怖主义行动的消息。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频繁进行致命袭击，其目标不只是中东国家，还涉及法国、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动，还在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发生。现在涉及伊朗的核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他们与西方的对立也正在解除。但与此同时，美国尚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伊朗则表现出了强硬态度，表示如果美国不解除经济制裁，他们有可能撕毁协定。另外，不断有非洲难民从叙利亚和其他受战火蹂躏的国家进入欧洲，从而带来了宗教和种族冲突。历史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些地方要实现政治稳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个现实就是，大多数恐怖主义行动或其他冲

突，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是贫困。所以如果我们能让更多人摆脱贫困，世界就能更多一些政治稳定，更少一些种族歧视，恐怖主义或其他冲突就会逐渐消失。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然非常重要和及时。很多时候，贫困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与发展缓慢，这意味着在很多地方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脱贫。比如，如果公路或高铁能够把欧亚大陆连接起来，欧洲和亚洲的人员往来、货物流动就会变得活跃，这不仅能极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能密切欧亚人民的关系，增强互信。

“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执行，金融的推动力必不可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因此应运而生。我们期望看到亚投行能够和世界银行、亚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紧密合作，在亚洲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力推进亚洲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我认为日本作为亚洲的重要发达经济体，也应该加入亚投行，为亚洲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也要高度关注并努力打造一个绿色金融体制，这样可以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减少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确保世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创建丝路国际联盟 (SRIA)，作为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进的平台，汇聚国际政要、世界经济金融界专家学者和企业界领袖，展开对话交流，贡献建议和智慧，是一个正确的举措。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也要把全球环境问题纳入丝路国际联盟议程中，促进合作、增进互信，让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进步，把该区域打造成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平反战的共同体。我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让东亚成为一个反对战争的共同体，确保东亚永远和平，绝不允许战争重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为东亚共同体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依据。因此，我衷心期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丝路国际联盟可以为 “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 珍妮·希普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我个人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甚至没有什么基础设施，无法加入国际市场，无法获取生存所需的水和粮食以及这个世界的信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生存在贫困之中，而贫困是滋生不满和不稳定的温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及周边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带来了脱贫和发展的希望，因而是很重要的，是有助于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大国担当，主动为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体现。在全球治理上，需要更加健全的机制，来推进国际合作，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也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机制和体制。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秘书处认真考虑了“丝路国际联盟”中“联盟”这个词，Union 和 Association 中文都可以翻译为“联盟”，但 Union 是排除性的，而 Association 是包容性的，所以最终确定使用“Silk Roa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简称“SRIA”。丝路国际联盟 (SRIA) 致力于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

际网络，通过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构建丝路民间合作与对话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所以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但是“一带一路”建设融资不可能只依靠亚投行这一个金融机构，肯定还需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我认为“一带一路”要取得成功，不能依赖援助模式，应该是发展投资模式。而且要根据投资目标国的具体情况或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调整相适应的投资模式，比如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是跨境的项目，需要承认某些市场主体地位，然后像亚投行等金融机构才能允许参与。另外，要确保私营部门也能参与这个倡议，这也是符合他们利益的。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设计完善的商业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丝路国际联盟可以汇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出谋划策。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程度普遍较低，其中一些国家国内形势也较复杂，丝路国际联盟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希望丝路国际联盟可以帮助公共和私营部门将资金和力量投入健康的项目，避免错误投资于债台高筑的项目。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前些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等方面，我希望今后也可以继续讨论上述问题，因为 IFF 在这方面确实有优势，我们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今后，随着 F20 倡议和丝路国际联盟倡议的提出，国际金融论坛 (IFF) 讨论的议题将扩大范围，站位也将相应提高。

加强国家金融顶层设计， 关注“一带一路”金融的现在与未来

■ 陈云贤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理事长、广东省原副省长



陈云贤

金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强盛的企业，离不开军事、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支撑军事、信息技术发展的是其强大的金融业。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呈现个性、分散、智能化的特征，而金融、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其重要的核心。

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推进国内经济改革，也离不开金融。目前，中国面临紧迫的金融改革、金融决策的关键时期。就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应完善中央改革发展的主框架。

2013 年 8 月 15 日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狭义的金融联席会议概念，应该有一个广义的金融组织制度来替代。我国已经进入了金融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时期，完善中央金融改革发展组织框架，强化国家金融顶层设计，采取系统性的金融改革发展措施，将有助于破解“十三五”发展的瓶颈。

第二，应明确国家现代金融体系的定位。

现代金融体系需要培育和发展四大市场，也就是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最终要建成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当今发达国家中，美国、英国等属于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德国、日本等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国在 1983 年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行使职能。1995 年颁布《商业银行法》，确定中国金融机构监管体制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在时间短、变化快、发展大的情况下，对目前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定位趋向，应该加强论证，加强正确指导实施。2015 年中国金融总资产超过 250 万亿，其中银行业占比近 90%，证券业约占 7%，保险业约占 3%。中国的金融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培育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但又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国应以顶层设计，明确国家现代金融体系的定位趋向。也可以理解为，在银行主导下，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优化联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功能，形成一个以服务于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健康且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

第三，应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包括了金融改革的相关设计。但现有金融政策执行的困境是，地方城市不作为或者说难有作为。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改革创新，都提出了金融支撑的需求。所以，需要理顺中央和地方金融发展监管体系，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组织，推进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分层发展监管的法律法规建设，并借此推动地方城市的金融改革创新，解决不作为、难作为的问题，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个人认为，可以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例大小对金融机构分类部署，明确建立中央和地方在机构准入和业务审批方面的权责利。在风险控制、监督管理方面，形成一个既适应地方差异和不同城市金融需求支撑，促进新的经济增长，又监管有序，中央地方分

层承担化解金融风险，从而弥补风险的完善机制。按此进程，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间探索设立区域性的城市保险公司问题。

第四，设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的交易结算中心。

目前，人民币正处在从周边化走向区域化、国际化，由贸易结算货币走向支付货币、储备货币的时期。中国央行在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但现实问题是，如何对接境内，从而形成离岸在岸互动，覆盖亚洲、辐射全球的活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美国在 1981 年 12 月批准建立“国际银行业务设施”（IBF, 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开创了通过在岸方式，设立离岸本币金融市场的先河，促进了美国离岸金融信托的发展。1986 年 12 月，日本在东京也建立了离岸市场，形成了一套离岸、在岸交易体系，促进了日元的输出和回流。

现在中国也应该考虑设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既能对接、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又能促成与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伦敦等离岸市场，在清算结算标准规则、法律制度体系等方面的对接速度，从而形成一个交流合作、监管联动、同步发展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国际管理中心。借此也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本土企业国际化以及国内银行的国际化。

第五，积极探讨金融秩序受到互联网+冲击的相关问题。

应该说，当前中国的网络金融还没有形成对现有金融体系、金融秩序功能的冲击。当前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也还未对中国货币发行体系、货币政策、货币监管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网络金融业务向综合方向发展的趋势，网络社交平台向金融化发展的趋势，新网络金融业态挑战金融监管和国家法律的趋势，促使我们应该在国家层面把网络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议事日程进行总体规划，统一规范和有序推进。网络金融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又有自身存在的特有技术风险、认证风险和监管风险，并可能冲击现有货币金融政策、制度，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探索研究健全网络金融结算体系，加强网络金融法律框架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层面、技术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相结合的网络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从而抢占发展的先机，防范潜在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

第六，应设立碳期货交易所，抢占国际金融的制高点。

“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银行、南南合

作基金等一系列高瞻远瞩、脚踏实地的举措，正在完善国际金融秩序。加快建设中国碳期货交易市场，并覆盖亚洲碳交易捆绑人民币结算，也将是中国抢占国际金融制高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弯道超车的新路径。

《2015 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碳排放峰值将出现在 2030 年。世界银行预测，2020 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总额将达到 3.5 万亿美元，碳交易市场有望赶超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机遇，显然要有一个顶层设计的体系。

1997 年 12 月，全球 14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控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制定了世界有形的商品贸易体系，《京都议定书》制定了世界无形的产品贸易体系。欧盟在全球率先制定了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2005 年正式运行；美国加州 2013 年也启动了碳交易体系；日本和印度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开始碳交易市场建设。中国如果能够加快创建碳期货交易所，在国际货币先后经历煤炭捆绑英镑结算，石油捆绑美元结算之后，我们可以用碳交易捆绑人民币结算为债权，制定标准，覆盖亚洲甚至全球。这样，中国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制度上弯道超车，脱颖而出。

如果把这个布局快速上升到国家层面，全面提出建立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加快创建碳期货交易所，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加快碳市场体系标准化建设，覆盖亚洲及全球，就有可能掌握未来的碳市场交易制度的主导权、话语权及定价权。

所以我认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国家层面的金融顶层设计，更加关注“一带一路”金融业的现在与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取得更大、更具实质性、相互共赢的成果。

中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欧洲 50 集团主席、法国前财长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来参加丝路国际联盟（SRIA）的启动仪式。

国际金融论坛（IFF）的中国同事们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以加强交流与合作，这点是我非常欢迎的。我也非常赞同丝路国际联盟所确定的宗旨和目的，就是通过构建丝绸之路民间合作与对话机制，增加信任、消除疑虑、建立共识。我希望借助丝路国际联盟这一平台，汇聚金融领袖和学者的才智，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研究，寻求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途径，满足大家的期望，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欧洲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应该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相当重要的，欧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十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倍增，2015 年已经达到了 3500 亿欧元；中国进口欧盟的产品更是达到了 1500 亿欧元。可以说，欧盟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因为出口有利于生产者，使其获得经济收益、扩大市场，也可以为其

所在国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进口有利于消费者，消费者可以因此享受到本国没有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进而改善和丰富他们的生活，这也是经济增长最大和最终的目标。

现在中国在进行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我认为这不但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造福全球所有人。相信通过经济改革和调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国际进出口贸易，以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欧洲在这方面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各类产品，不仅是奢侈品，还包括农产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

我认为，欧盟国家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利用中国政策的调整，大力发展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维持和增加对欧盟的出口，因为这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并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大家都知道，欧洲现在面临民粹主义的压力，反对全球化。从长远来说，我认为欧盟和中国应该找到一种更好的、更平衡的交流方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在金融方面，欧洲当然需要更多中国公司投资欧洲，我相信中国也可以给欧盟的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所以，不仅是中国和欧洲，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其实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将助力和指引我们采取适当的多边或双边政策和措施，以建立一个更好的营商、金融监管和关税环境。在“一带一路”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包括政治方面的阻碍，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维护和用好中国和欧盟的良好关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为沿线和周边国家的人民创造福祉。

“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之一

■ 于洪君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经济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周期。可以说, 发达国家或者说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都陷入了低迷状态;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原来一度被看好的新型经济体国家, 有些甚至回到了负增长的经济运行轨道; 整个世界还有十亿人口亟待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面对这种形势, 许多国家的政治家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一些专家、学者夸夸其谈, 但找不到切实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出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经过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冷静观察,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应当说,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的众多方案中最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案。

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是以世界文明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世界文明是多元、平等、包容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 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休戚与共的, 所以我们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发展共同体, 有了发展共同体的意愿, 在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就会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 最后走向命运共同体。所

以“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有坚实的现实和理论基础的, 是有科学的认识前提的。

另一方面, 我们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之一, 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或外交宣传辞令, 它有一整套的政策主张原则。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 在各类国际场合反复阐释了“一带一路”实施的一些具体想法。不仅如此, 中国还经过认真缜密研究, 制定了国家指导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 这是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共同制定发布的, 所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之一, 它有一整套的思路部署和计划。

“一带一路”包括五个密切联系的环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缺一不可。所以“一带一路”是一个完整有序的倡议。

可以说, “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一个大通道, 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新机制。同时, 它也是中国创新区域合作的一个新思路。中国周边地区很多国家由于历史积怨、利益纠纷或民族、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原因, 合作的意愿不强, 合作的质量较低, 亟需一个区域合作的新思路、新方案, 所以“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为此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案。众所周知, 南南合作步履维艰,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到现在, 发达国家的表现差强人意, 南南合作收效甚微。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首先是动员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 与世界其他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发展, 所以“一带一路”为重启南南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确立了新标准。而且, “一带一路”也为重新构建、开创北南合作的新局面提供了新思路。毕竟至今为止, 发达国家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方面, 一直是承诺多, 而行动甚少。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不仅欢迎“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 我们也希望能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携手, 共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所以, “一带一路”绝对不是排他的、封闭的, 而是开放的、合作的, 是以互利互惠、平等共赢为终极目标的。事实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认可、认同, 愿意提供支持, 甚至愿意参与。

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配套机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供资金支持。大家知道, “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所需资金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无论亚行、世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都十分有限, 所以中国创建了亚投行, 当然亚投行也不能完全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但是, 有了这样一个机制, 就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缺陷做出了某种补充。

另外, 我们创建了丝路基金、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以及中国和中东国家的中东合作基金等等。我们创建的基金不是自娱自乐的卡拉 OK, 我们把这个平台搭起来, 动员方方面面的资金, 包括世行、亚行以及发达国家的资金, 应该说现在在这个方面, 我们所做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另外, 还有一系列论坛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支持。比如中非论坛、中拉论坛 (中国 -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都被动员到“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来了。中国和很多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协定或意向书。所以, “一带一路”倡议有一系列的组织手段、组织机构和金融平台作为支撑。现在,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 从企业到社会, 方方面面都在谈论“一带一路”, 都在挖掘自己的潜力,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进程。“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作出的一个庄严承诺, 它是不会倒退的。前进的道路尽管会有曲折, 会遇到很多困难, 甚至会有个别项目遭遇挫折和失败, 但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 决心是不会动摇的, 而且力度还会加大。所以我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

振兴世界经济、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建立一个良好的世界经济秩序、为人类社会走向未来, 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和行动方案。

当然实施“一带一路”不可能一蹴而就, 不能急功近利, 它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 因为有的“一带一路”项目在有些国家可能一搞就是几十年。但我们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把它进行下去。中国人民愿意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也相信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摒弃自私的战略考虑, 参与到有利于全世界的“一带一路”进程中来。

我们坚信, “一带一路”的前景是美好的, 人类的共同发展前景也是美好的。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不仅欢迎“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 我们也希望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携手, 共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所以, “一带一路”绝对不是排他的、封闭的, 而是开放的、合作的, 是以互利互惠、平等共赢为终极目标的。

关于丝路国际联盟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 马儒沛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执行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马儒沛

2013 年 9 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 首次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同年 10 月, 习主席访问东盟国家, 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 倡议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随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并作为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此, “一带一路”正式升级为国家顶层设计。

我认为“一带一路”首先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一个开放性战略, 充分展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 同时它又是在新形势下, 面向全球提供的一个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发端于中国, 贯通中亚、东亚、南亚、西亚乃至部分欧洲区域, 东连活跃的亚太经济圈, 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牵动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 占全球的 29%。覆盖人口高达 44 亿, 占全球的 63%。目前, 已有超过 70 多个国家表示参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覆盖的国家之多、民族结构之

复杂、语言之丰富、风俗之不同、经济制度之差异, 可以说是罕见的。这充分表现出“一带一路”这项系统工程之艰巨性和复杂性, 特别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增长潜力各不相同。因此, 一方面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较强, 彼此合作的空间巨大; 另一方面挑战性也极强, 需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想为精神引领, 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来展开, 才能找到发展的共同需求点。

丝路国际联盟的建立,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深化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理念和框架, 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对于深化交流合作、增强互信以及高层引领推动、搭建共享平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作用。因此, 对于丝路国际联盟的发展, 我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 丝路国际联盟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区别情况、一国一策的办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克服困难、推进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的, 用一国一策的办法, 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 把多样化、多元化、差异化的问题, 疏解、理清, 并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低到高, 认真加以解决。这将对丝路国际联盟的开局起步很有利。

第二, 丝路国际联盟的建立应坚持国际性、民间性、独立性、客观性的原则, 始终牢记丝路国际联盟为全球经济治理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金融改革创新服务的历史使命, 要紧紧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 发挥好外交平台和战略智库的作用。当前, 特别应该在宏观政策的沟通、法规条款的变通、公共外交的融通、金融资本的流通和桥梁纽带的贯通上, 彰显出丝路国际联盟的优势, 实现其重要价值。

第三, 丝路国际联盟的建立应配合 G20 杭州峰会顺势发力, 大有作为。G20 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 峰会设置了创新增长



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的发展四大议题,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提出的“F20 重塑金融本质, 致力于推动新资本、新价值, 新世界, 创建全面可持续发展新文明时代等六点建议, 我认为与 G20 的主题和四大议题是高度契合的。F20 倡议对世界经济金融无疑注入了新的活力, F20 要紧扣深化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 适时提出如何协调全球宏观政策, 如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如何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如何严防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 提出重要的智库思想和对策建议。

第四, 丝路国际联盟的建立应重视对宏观经济安全等问题提出重要的智库意见。宏观经济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反映的是主权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破坏和威胁的一种状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样有宏观经济安全问题, 反映在 F20 这个平台上, 就要致力于打造安全、诚信、高效、绿色的现代金融, 提出重要的智囊建议, 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 丝路国际联盟的建立应鼓励全球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海外侨胞的力量, 积极参与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已经写入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中。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会议上, 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全面阐述部署时, 明确要求要注意发挥华侨华人这个重要优势, 通过他们做驻在国的工作, 为对外工作加分。这充分体现了侨务工作在国

家对外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为侨务工作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有 6000 多万, 分布在全球 198 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还有 3000 多万归国华侨在祖国各地, 各类华侨华人社团有 25000 多个, 全球的华商总资产已经达到 5 万亿美元。我想这些都是重要的力量。

作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 广大华侨华人在开拓国际经济、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丝路国际联盟应引导和促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

当前应特别重视动员华侨华人中的精英阶层和重点社团侨领以及众多的华文媒体,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参加国际竞争、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作用, 我相信丝路国际联盟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独特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关于“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的几点看法

■ 余利明 / 中国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余利明

今天发言主要和大家分享本人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的几点看法。

一、从需求和动力的角度看“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从其国内的角度还是从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都是极其旺盛的。以总体基建投入占 GDP 的 5% 左右来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对基建的需求会达到 1 万亿美元以上。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财政紧张，导致基建投资不足，因而普遍呈现基础设施落后的状态。从各项指标来看，无论是人均 GDP 还是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例如，与基础设施相关联的城镇化指标，沿线国家与中国比较就有 10% ~ 30% 的差距。由此来看，中国在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和产品、服务能力，可以引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

二、“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回报与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一般而言它

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而且总体上投资周期很长。就是在中国也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从投资角度来看是不错的，比如在中国的公路投资，特别是高等级的收费公路的投资，中国投资界普遍认为是道路印钞机。但是如果我们再看近几年大家非常瞩目的高铁，大部分高铁的投资是不盈利的，甚至回本都有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商业可行性在哪里？其实从长远来看，基础设施应该属于一个公共产品，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经济外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的，远非基建投资本身的收益所能比较。

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有可能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角度，甚至不是根本性的。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它会全面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既拉动内需又带动沿线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而且更根本的是，我个人认为通过投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种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担当和责任。另外，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金融投资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

三、社会资本在“一带一路”基建投资当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家通常认为的财力资本，另一类是智力资本，丝路国际联盟很明显是属于后一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提三个建议。

第一，在丝路国际联盟倡议下，综合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产品的标准化。在全球经济秩序当中，石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产品，它的报价、标准，每个区域不同的油品，有一个相当广泛、全球认可的标准；我们再看航运，有大家公认的波罗的海指



数、全球贸易运费指数等；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公路为例，目前全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信息不透明而且没有统一的报价标准和机制，往往这里会蕴含着所谓经济的隐性成本，包括区域的腐败成本。我认为 IFF 研究院可以组织力量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品的标准化。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希望能够以主权信用在全球范围发行“一带一路”基建长期债券。大家都很清楚，基建是一个投资大、回报低的长期行为。它的经济外部性具有明显的准公共品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建设首先第一个责任应该是国际机构或政府。中国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

但这些举措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如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属性和投资属性都充分发挥出来，还应该做出一些创新举措。比如，可以用类似发行国债的方式，发行 20 至 30 年的离岸人民币“一带一路”基金债券。这个基金债券可以分销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重要国际机构，沿线国家顶级的一两个金融机构也可以认购一部分。如果中国每年发放 1000 亿美元或 10000 亿人民币，整个区域的投资落实到位就能够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通过有效的金融中介和社会资本合作，把

基建项目转为可投融资的项目。前两个建议更多会涉及社会资本里面的智力资本这个层级，需要商界、学术界的有关专业人士共同努力。第三个建议会涉及财力资本层面。简单讲就是，一方面要帮项目找资金，另一方面也要帮资金找项目。在这方面，香港已经走在了前面。香港金管局两个月前成立了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 (IFFO)。IFFO 已经与 41 家国际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基建项目的发展机构成为合作伙伴。IFFO 通过这种联盟的方式，积极促进区域的投融资。

我认为，我们丝路国际联盟倡议在国际金融论坛 (IFF) 平台之下，可以借鉴 IFFO 的做法，融通成立类似的基建基金，促进区域的基建发展。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着眼宏观大局·关注金融动态·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是反映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宗旨。《国际金融论坛》会刊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成为中国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本土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扫一扫加关注
微信：IFFweixin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 IFF 全球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IFF 全球战略文库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出版声明:

- * 本刊仅供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用途
-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而成，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复印件、复制品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

General Statement:

- *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mmercial use is prohibited.
-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materials.
- * Views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original opinions from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dat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consent from the editorial team. Violators may be subject to legal proceedings.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廣州·上海·香港·華盛頓